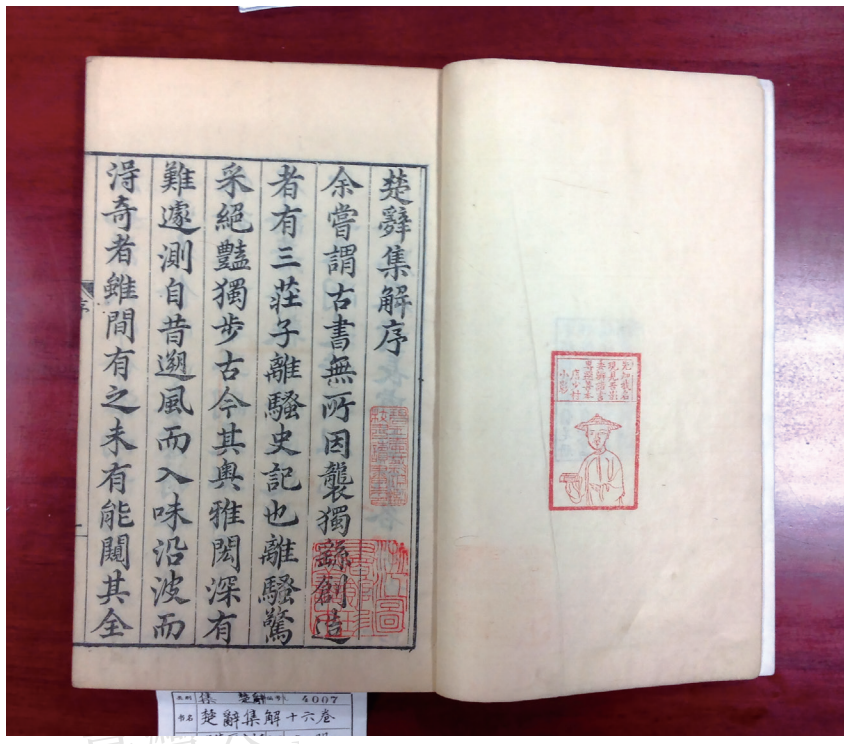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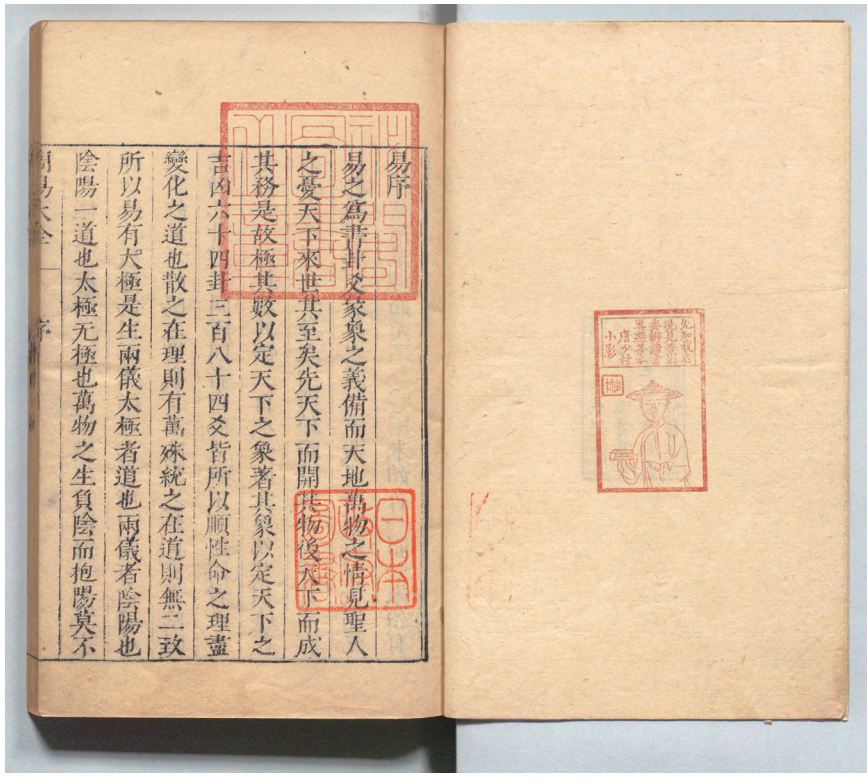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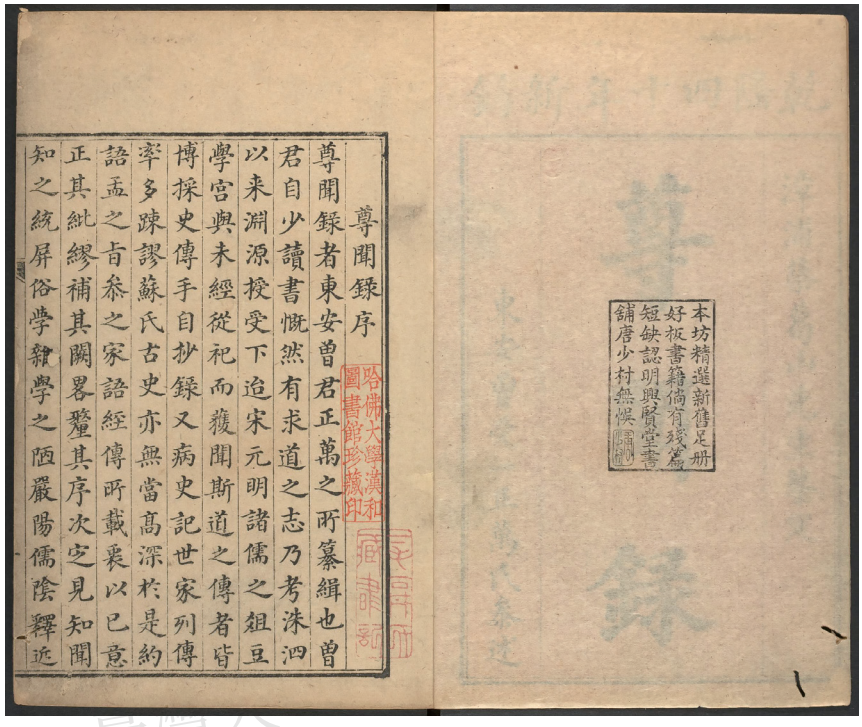
《楚辭集解》書前唐少村廣告墨記　浙江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楚辭集解》書前唐少村肖像廣告　浙江圖書館藏　作者自攝



《五經大全》書前唐少村肖像廣告　日本　內閣文庫藏



《尊聞錄》書前唐少村廣告　美國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DOI: 10.6541/TJAH.202209_(53).0004

肖像廣告：唐少村興賢堂與中日書籍貿易*

林振岳**

【摘要】廣告傳播史、印刷史論著常常提到「唐少村興賢堂」，作為明代書坊肖像廣告的典範。唐少村使用自己肖像作為廣告，並印有「本坊精選新舊足冊好板書籍，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品質擔保承諾，在書業廣告中別具特色。過去學者認為唐少村興賢堂所處年代是明萬曆年間，在圖書版本上往往也將唐少村興賢堂作為一個出版書坊著錄。本文從圖像形象、目錄調查以及書籍流通史的角度進行考察，認為唐少村戴笠形象的肖像廣告是受到清代肖像藏書印的影響而產生，並非明代廣告。通過調查現存帶有唐少村廣告的書籍五十餘種，可證實興賢堂是清道光年間的一間銷售新舊書籍的書鋪，並非出版書坊。文中進一步從清朝晚期中、日兩國書籍傳播史的角度分析，考察唐少村參與漢籍外銷的史實，證實興賢堂是蘇州的一家書鋪，並推測其肖像廣告可能主要用於外銷日本的漢籍之上。

關鍵詞：肖像廣告、廣告史、出版史、書籍傳播史、唐少村興賢堂

肖像商標、廣告是使用人物肖像作為標識的特殊類型，在近代西方攝影技術傳入中國後，被廣泛地使用在商業商標與廣告上。學者認為以生產者或創始人肖像作為主體圖案的商標、廣告，能夠提升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係。① 現代肖像商標、廣告的興起與攝影技術傳入密切相關，但往往也被認為有著更為久遠的中國文化傳統。在研究中國古代商標、廣告的論著中，研究者常常把肖像廣告的起源追溯到明代出版業出現的書坊坊主肖像牌記，如余氏雙

* 本論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中國印譜書目調查與整理」（編號2022ETQ003）研究成果。論文研究期間承京都大學梶浦晉先生、中原理惠博士、立命館大學芳村弘道先生、山東大學杜澤遜先生、王曉靜先生賜教，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提供了重要修改意見，執行編輯陳卉秀女史細心審校全稿，謹致謝忱。文中任何錯誤，概由筆者本人負責。

**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 助理教授

① 侯曉盼，《方寸故事：中國近代商標藝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9），頁2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桂書堂主人像、建陽書坊余象斗像等，其中還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唐少村興賢堂」。這個廣告上使用了唐少村的肖像作為廣告，且印有「本坊精選新舊足冊好板書籍，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品質擔保的廣告語，在中國書業廣告之中，別具特色。此例一經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引用，② 即被研究者廣泛地使用於中國古代書籍史、廣告史、傳播史的論著之中。如美國學者賈晉珠《謀利而印》認為它是與明代福建坊主肖像廣告一樣的出版商肖像。③ 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將該例作為明代出版商肖像典型，藉此討論出版商與讀者之關係：「在一個創造性的廣告年代裏，實際上出版商是使他自己成為了正在推銷的商品。這種親密關係的表象，用廣告人的臉所給予的看似真誠的形式表達出來，它掩蓋了出版者和其消費者間首要的經濟和非個人的交換本質。」④ 孫文傑《中國圖書發行史》、⑤ 吳永貴《中國出版史》、⑥ 肖東發《中國編輯出版史》⑦ 引為古代版權保護及防偽的例子。王海剛《明代書業廣告研究》將其作為明代「塑造出版者品牌」之例。⑧ 李鵬

②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373。

③ 賈晉珠著，邱葵等譯，《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頁276。

④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52。

⑤「書坊為了使自己出版的圖書不被別的書坊假冒，而採用許多辦法，如在所出版的圖書封面上印有人像，類似當今的商標人像圖案。其作用顯而易見，一是宣傳自家出版圖書質量可靠；二是招徠讀者購買。例如，《楚辭集解》一書封面上印有唐少村小影半身像，頭戴斗笠，手執書冊，上欄有『先知我名……專選善本』。這是一種以圖像照片方式向讀者保證的一種行為。」孫文傑，《中國圖書發行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頁259。

⑥「還有的書商將自畫像刻入書中，以宣示版權，如興賢堂刻《楚辭集解》中，就印有書坊主人唐少村戴笠執書的半身畫像。」吳永貴，《中國出版史》，上冊，古代卷（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8），頁365。

⑦「又如明金陵興賢堂刻本《楚辭集解》，書前印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誤。』不但為本堂作了廣告，而且給讀者以質量保證。」肖東發，《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頁355。

⑧「明代書坊主很注重自己的聲譽……有的為了自我宣傳，把自己的小像刻在書上，以自己的人格和聲譽作擔保，推薦品牌，承諾圖書品質。」王海剛，《明代書業廣告研究》（長沙：嶽麓書社，2011），頁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古代圖書出版營銷研究》認為這個肖像廣告承擔著宣傳書坊形象及品質擔保的功能。⑨ 邵科〈經濟史視野下的商標法：中國與歐洲的對比〉一文則將唐少村廣告與歐洲同時期商標作對比：「雖然這類構思不能滿足今人的時尚需求，但與前現代歐洲的商標相比，已經十分有巧思。」⑩ 此外，在論及中國古代牌記、商標標識的論文中，也經常將它作為明代廣告商標的代表，如侯曉盼《方寸故事：中國近代商標藝術》、⑪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業廣告〉、⑫ 雷子人〈20世紀初期商業美術之人物「塑形」〉⑬ 等論著，皆把唐少村興賢堂看作是明代書坊肖像廣告的典型，該例在廣告史、書籍傳播史研究上有較大影響。⑭

然而事物之興起往往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尤其是具有符號特徵的人物肖像。英國學者彼得・伯克認為人物肖像是按照「套式」系統構成的一種符號形態，⑮ 會較為明顯地受到時代的影響。從時代風氣上看，明代版畫興盛，將坊主形象印在書上作為廣告者大多是構圖複雜的版畫，唯獨唐少村興賢堂是單一肖像，與其他書坊風格迥異。並且，唐少村將廣告語與肖像分開鈐印的方式，更像是受到清代肖像藏書印「套式」的影響。因此，在將唐少村視為明代肖像廣告典範及中國肖像廣告的源頭之前，需對此一特殊的例子所處的年代、出處作一個詳細的考察。

---

⑨ 李鵬，《中國古代圖書出版營銷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2013），頁212-213。

⑩ 邵科，〈經濟史視野下的商標法：中國與歐洲的對比〉，《清華法學》，4卷5期（2010.9），頁145。

⑪ 侯曉盼，《方寸故事：中國近代商標藝術》，頁249。

⑫ 袁逸，〈中國古代的書業廣告〉，《編輯之友》，1993年1期，頁69。

⑬ 雷子人，〈20世紀初期商業美術之人物「塑形」〉，《新美術》，2020年4期，頁54。

⑭ 其他引用到此例的論文有：闞寧輝，〈試論坊刻圖書的牌記及其廣告特色〉，《出版與印刷》，1993年2期，頁92-95。施勇勤，〈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編輯學刊》，2001年6期，頁22-24。劉曼麗，〈中國古籍的廣告〉，《華夏文化》，2002年2期，頁38-41。孔正毅，〈試論古代圖書的版權保護〉，《出版發行研究》，2003年6期，頁77-80。席興利，〈肖像標誌的形態變遷與文化內涵考略〉，《電影評介》，2008年22期，頁84、88。余曉宏，〈明清時期出版行業的出版權益保護〉，《編輯之友》，2011年3期，頁96-98。馬秀文、李宏達、王卓，〈我國古代書籍廣告略論〉，《圖書館工作與研究》，2014年7期，頁69-71。張曉東，〈中國古代版權保護及影響〉，《法制博覽》，2017年18期，頁277。等等。

⑮ 彼得・伯克著，楊豫譯，《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將從五個層面論證唐少村肖像廣告之年代及性質：一、證明「唐少村」非明代金陵書坊「唐少橋」，二者產生關聯出於張秀民先生誤會。二、從唐少村廣告「戴笠小像」這種形象的角度，分析此形象是在清人剃髮以後才逐漸流行，並結合清末外銷畫小販形象對比，說明唐少村肖像廣告是清代晚期效仿藏書家肖像藏書印的產物。三、通過調查現存帶有唐少村廣告的書籍58種，年代最晚至清道光年間，其中一種有清道光十八年（1838）唐少村親筆題記，可證實唐少村為清道光年間人物。四、論證唐少村興賢堂是書籍的銷售方而非出版方，「唐少村小影」肖像廣告不可著錄為牌記。該肖像廣告將書籍上承載的人物肖像範圍從「作者」、「出版者」、「藏書者」拓展到了「經營者」。五、從東亞中日書籍流通史角度，分析帶唐少村廣告書籍的流通路徑，證實唐少村興賢堂是清道光間蘇州書鋪，通過唐船將書籍銷往日本，「唐少村小影」肖像廣告可能是一個「外銷廣告」，用於外銷漢籍之上。

一、唐少村非明萬曆間金陵書坊「唐少橋」

唐少村興賢堂的例子，最早見於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引用：

> 金陵書賈有把自己小像刻成大木戳，用朱色印在黑色方木戳的廣告反面上，如萬曆四十三年本汪瑗《楚辭集解》，有唐少村（即唐少橋）小影半身像，戴笠，手執書冊，上欄有「先知我名，現見吾影，委辦諸書，專選善本」四行小字，在廣告上可說是創新。⑯

唐少村興賢堂使用了坊主肖像作為廣告，且刊有品質擔保承諾的木記，在明代即具有如此強烈的廣告宣傳意識，令人頗有開風氣之先之感。姜亮夫先生《楚辭書目五種》也特意著錄這個木記，並謂「扉頁有書坊標識，亦有關一時風氣」。⑰

⑯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頁373。文中兩「戳」字原書誤排作「戮」，據該書初版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改。

⑰ 姜亮夫，《楚辭書目五種》，見《姜亮夫全集》，第5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少村興賢堂被認為是明代的書坊，主要是因為這個廣告印在明萬曆間刻本汪瑗《楚辭集解》書上。這部《楚辭集解》現藏浙江圖書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汪瑗之子汪文英家刻本，書中尚留有未刻字墨釘多處，是一部初印本。如卷端僅署撰者「新安汪瑗玉娜集解」一行，旁邊一行留了長墨釘，應該是留予補刻編校者姓名。這套書版後來歸了汪瑗的侄子汪仲弘，於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補刻，並改卷端之編校者墨釘為「侄仲弘補輯」。⑱ 通過調閱原書可以確認，唐少村的肖像廣告是分別印在書前空白扉頁的正背兩面，正面鈐楷書木戳墨記：「本坊精選新舊足冊好板書籍，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唐少村。」背面有鋪主唐少村小影，紅印。印上人物頭戴竹笠，右手手執一卷，左手指卷而言，像頂有「先知我名，現見吾影，委辦諸書，專選善本」四行小字，低一格有「唐少村小影」五字（圖1、圖3）。在其他書籍上，這個廣告還有一種在「唐少村小影」五字之下鈐「少村」篆字朱文小方印的樣式，「少村」二字應是單獨的戳記加鈐上去（圖2）。

楷書木戳墨記最後署名的「唐少村」三字為篆文小印，張秀民先生《中國印刷史》書中摹寫此印，誤認篆文「村」字為「橋」字（圖4），因而認為「唐少橋」與「唐少村」為一人：「黑木印廣告末有『唐少橋』三字小方印，可知唐少村興賢堂書鋪與金陵書坊唐少橋實為一人。」⑲ 明代的確有一個「唐少橋」的金陵書坊，如明萬曆十七年（1589）刊刻過《類編傷寒活人書括指掌圖論》一書，內封有「萬曆己丑金陵書坊唐氏少橋梓行」字樣。張秀民先生可能有先入為主的印象，誤認廣告木記中「唐少村」為「唐少橋」，並且唐少村的印記正好也是鈐在明萬曆刻本之上，時代相仿，於是張冠李戴，將二者認作一人。研究明代書業、廣告者遂多沿用此說，或引作「唐少橋」，或引作「唐少村」，以為二者係同一人。如《明代書業廣告研究》、⑳《從精英文化到大

⑱ 卷一改為「秣陵焦竑弱侯訂正」，其他各卷皆改為「侄仲弘補輯」。
⑲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頁372。
⑳ 王海剛，《明代書業廣告研究》，頁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眾傳播 明代商業出版研究》、㉑《江蘇藝文志・南京卷》、㉒《明代書坊之研究》、㉓《謀利而印》、㉔《*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㉕等論著都誤信張秀民先生之說，將二者混為一談，或誤以為唐少村在兩地開鋪經營。㉖

從唐少村廣告木記作為一個單獨的木戳的形制，以及「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文字內容來看，唐少村興賢堂出售此書，有兩種可能。一是唐少村購借書版刷印出售，因此打上自己的肖像廣告木印，作為牌記；一是唐氏並未經手書版，只是買入新舊書籍出售，順便打上自己的書鋪廣告。兩種不同的經手方式，性質完全不同，前者為出版方，後者只是銷售方。從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形式上看，一般銷售書籍的書鋪很少在經銷的書上印上這麼鮮明的木戳，最多是打上價格一類的標籤。就一般情況而言，這樣的木記更接近中國古代書坊（出版方）經營方式，購借版片刷印的可能性更大。學者們也偏向這種看法，認為《楚辭集解》一書在汪文英初刻本與汪仲弘補刻本之間，曾被唐少村借版刷印出售。如崔富章先生認為是「興賢堂繼續刷印汪文英刻版本」，㉗ 因此在著錄此書的時候，往往也就把這個廣告印當作牌記了，崔富章先生《楚辭書錄解題》著錄為「明唐少村興賢堂書鋪重印汪文英刻本」，㉘ 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著錄為「明萬曆四十六年金陵書林唐少村興

㉑ 張獻忠，《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 明代商業出版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頁93。

㉒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江蘇藝文志・南京卷》，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頁412。

㉓ 陳昭珍，《明代書坊之研究》，收入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七編，第1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頁52。

㉔ 賈晉珠著，邱葵等譯，《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頁276。

㉕ Cynthia J. Brokaw, Kai-Wing Chow,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117.

㉖ 王三慶，〈明代書肆在小說市場上的經營手法和行銷策略〉，《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にわたずみ》（東京：二玄社，2004），頁37。

㉗ 崔富章，〈《楚辭》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辭要籍解題》之訛誤〉，《浙江學刊》，1987年1期，頁124。

㉘ 崔富章，《楚辭書錄解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頁108-1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賢堂刊」。[29] 依此思路，唐少村能夠借得這套書版重印，必然是在汪仲弘剜改之前，即在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到四十六年（1618）三年間。而張秀民先生又將「唐少村」與「唐少橋」兩人名字混淆，兩相巧合，遂將唐少村興賢堂認為明萬曆年間的書坊。

二、戴笠小像：唐少村肖像廣告為清代流行肖像形象

明代有將坊主小像印在書上的例子，如明弘治刻本《周易傳義大全》有余氏雙桂書堂主人像。建陽書坊余象斗，所刻《海篇正宗》、《詩林正宗》、《四民便覽》等有「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圖5），唐少村若是明朝書坊，用肖像作廣告，在當時風氣看來，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余象斗、余氏雙桂堂所附的圖像，構圖都比較複雜，並非單一肖像，與當時盛行的版畫風格一致。這種版畫牌記直到清初還被書坊使用，日本江戶初期的刻本也有效仿者。而唐少村採用肖像作為廣告牌記，是單一的戴笠形象人物肖像，與明末清初的版畫牌記風格差異較大，而與清代肖像藏書印形制更為相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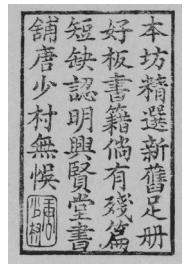
清代的肖像藏書印是康熙年間朱彝尊（1629－1709）之後漸漸流行。文獻記載朱彝尊有一戴笠小像的肖像印，且與「購此書，甚不易，願子孫，勿輕棄」銘印同用，[30] 這方肖像印未見存世，但戴笠小像的形象，其文集《曝書亭集》書前附刻的《竹垞先生像》可以參考。清乾嘉間陳鱣（1753－1817）模仿朱彝尊，刻了一方戴笠形象的「仲魚圖像」，並仿刻白文銘印「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與「仲魚圖像」兩印同鈐。其後吳雲（1811－1883）「吳平齋五十歲小景」、季綸全「右申先生小景」等，也都是戴笠形象。之所以說肖像藏書印是清代以後才流行，除了文獻上的記載可以驗證，還因為初期的肖像藏書印有著特殊的「戴笠小像」這種套式，這種「戴笠小像」是入清以後受到剃髮令影響才逐漸流行的。漢人士大夫羞於以剃髮光額的形象流傳後世，所以選擇戴笠的形象作為遮掩，清初的王士禎、錢謙益、吳偉業、徐釚都有這樣的形象傳世。而唐少村的肖像廣告同是這樣的戴笠形象，如果出現在明

[29] 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83），第7卷，頁8。
[30] 楊立誠、金步瀛，《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5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朝，似乎過於超前。其次，「唐少村小影」與「本坊精選……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廣告擔保語配合使用的形式，與朱彝尊、陳鱣肖像藏書印及藏書銘印搭配使用的方式極為相似，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其受到清代藏書家肖像藏書印的影響（表1）。

表1 清代肖像藏書印與唐少村肖像廣告

				
朱彝尊	陳鱣	吳雲	李綸全	唐少村
				
朱彝尊	陳鱣			唐少村

唐少村興賢堂肖像廣告受到清代肖像藏書印的影響，則很可能是清代乾嘉以降的產物。在清朝晚期的外銷畫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形象。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部《中國清代外銷畫》中有清朝晚期商販的形象，其中「賃書」、「賣木魚書」、「賣新文」等圖所呈現的小販形象，與唐少村戴笠持書的形象十分相近（表2）。這種形象也應是受到清代流行的「戴笠小像」這一套式影響，從而形成清朝晚期大眾心目中販夫走卒的普遍形象。唐少村結合士大夫肖像藏書印戴笠形象與自身職業，創造出了「唐少村小影」這一肖像廣告，可謂雅俗共賞，在書業廣告中別開生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2 清朝晚期外銷畫中小販形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

				
賃書	賣木魚書	賣新文	賣茯苓糕	賣雨帽

三、書籍例證：唐少村所處年代

從以上圖像形象分析可知，唐少村的形象與明代人物版畫廣告風格不同，反而與清朝肖像藏書印及清朝晚期流行的小販形象接近。前文已說明，唐少村與明萬曆年間的金陵書坊「唐少橋」無關，二者被認為是同一人純粹是出於張秀民先生誤會。那麼，遵循「孤證不立」的原則，唐少村具體所處的年代也不能因這個廣告印在萬曆刻本《楚辭集解》書上即認定為明朝，需重加考慮。順著前人的思路，唐氏興賢堂倘若是一個出版書坊，所刊印的書籍應該不止《楚辭集解》一種，證實其時代最好的辦法就是找出更多的例子。然而這並非易事，印刷史、廣告傳播史研究者多是祖述張秀民先生之說，鮮有提及第二例。筆者八年間通過爬梳公私書目、論著、海內外館藏藏品及拍賣會拍品，調查得到版本著錄為「唐少村興賢堂」刻本、或帶有唐少村興賢堂廣告的書籍58種，今以原書刊印時代為先後順序，列目如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3 唐少村興賢堂相關書籍

	書名	版本	館藏/出處	備註
1	《莊渠先生遺書》	明嘉靖四十年（1561）序刊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書前白紙扉頁正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另有唐少村朱筆題記。有「葛雲薛印」、「履坦」、「壹是堂讀書記」、「筠房」、「金生閣」、「昌平坂學問所」、「天保庚子」、「淺草文庫」諸印。
2	《念菴羅先生集》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	南京圖書館	2012年北京匡時春拍「過雲樓藏書」拍賣會拍賣時著錄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唐少村興賢堂刻本」，其後出版《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改為「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本」，且注明：「是書扉頁有唐少村興賢堂題記。」㉛ 有「筠房」、「慎餘」、「泉」、「金生閣」諸印。
3	《閑闢錄》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程纘洛刻本	日本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中央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4	《鄭端簡公徵吾錄》	明翻刻本 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降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書前扉頁背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華□記號」、「谷澤藏書」印記。
5	《方氏墨譜》	明萬曆間刻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㉛ 陳海燕、葉建成，《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2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梅禹金詩草》	明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為「明萬曆十一年興賢堂書鋪刻本」。原書前扉頁正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悞」墨記，背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金生閣」、「筠房」、「寶泉」、「華□記號」諸印。
7	《翌翌集》	明萬曆十五年（1587）序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	徐乃昌《積學齋藏書志》著錄作「明刊本」，並云：「首護葉有正書方木戳云：『本坊精選……唐少村無誤。』此戳不常見，蓋明坊本也。此書亦難得。」㉜有「金生閣」、「六合徐氏孫麒珍藏書畫印」、「孫麒氏使東所得」、「希齋所得善本」、「古柳郭氏珍藏」、「延古堂李氏珍藏」、「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南陵徐氏」、「積學齋」、「徐乃昌暴書記」、「積學齋徐乃昌藏書」諸印。（徐承祖、徐乃昌等舊藏）
8	《詩法》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序刊本	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序　唐少村興賢堂刊」。書前扉頁背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天官大夫」、「澍」諸印。
9	《程氏墨苑》	明萬曆三十三（1605）年刻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悞」墨記。有「芳茂山房所藏」、「筠堂」諸印。

㉜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3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0	《東坡先生全集》	明萬曆三十四（1606）年刻本	2014年泰和嘉成春季拍賣會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星聚堂珍藏圖書」、「衡門璠璵堂圖書」、「衡門璠璵堂秘笈不許出閫印」、「惜陰室藏書印」諸印。
11	《楚辭集解》	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刻本	浙江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碧玉壺蔡鴻鑑校書讀書之印」、「四明墨海樓蔡氏鈐記」、「名山祕府之藏」諸印。
12	《葛一龍集》	明崇禎間刻本	美國國會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明崇禎間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函套簽題『葛一龍集，凡十四種』。冊一扉頁有牌記題『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下鐫『唐少村』印記。」㉝
13	《升菴先生群書麗句》《翰林秘授新題纂組》	明崇禎間刻本	2021年4月京都祇園會春季拍賣會 2021年6月北京榮寶春季拍賣會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華□記號」印記。
14	《唐宋八大家文鈔》	明崇禎間刻本	2013年上海工美春季拍賣會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駒井氏祕笈記」、「濱野弋藏」諸印。

㉝ 范邦瑾，《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2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	《十三經註疏》	明崇禎間刻本	日本姬路文學館	《周易兼義》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16	《畫史會要》	明崇禎四年（1631）序刊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小山文庫」印記。
17	《本草彙言》	清順治二年（1645）大成齋刻本	日本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華□記號」、「三角氏圖書記」、「京都府圖書印」諸印。
18	《近思錄集解》	清順治康熙間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華□記號」、「篁邨島田氏家藏圖書」、「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南葵文庫」諸印。
19	《佩文齋書畫譜》	清康熙間內府刻本	日本東京古典會2019年入札會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惕甫」諸印。
20	《中晚唐詩紀》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立命館大學（高木文庫）	書前扉頁正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背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西莊文庫」印記，為江戶時代末期伊勢松阪（現三重縣松阪市）藏書家小津桂窗舊藏本。
21	《香祖筆記》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岩國徵古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22	《廣東新語》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古川氏藏書」、「古川氏藏書記」、「金石文庫」、「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省軒圖書之記」、「贊岐大西見山舊藏書」諸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3	《訂補古今治平略》	清康熙三年（1664）序刊本（卓觀堂）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華□記號」、「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南葵文庫」諸印。
24	《日講易經解義》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日本大阪大學總合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康熙二十三年興賢堂書鋪唐少村刊本」。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有「時習館圖書之印記」、「衣洲鑒藏」（籾山衣洲）諸印。
25	《庸行編》	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有「昌平坂學問所」、「天保壬寅」、「淺草文庫」諸印。
26	《繪事備考》	清康熙三十年（1691）金閶大雅五雅堂刻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尚賢堂圖書記」印記。
27	《堯峰文鈔》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林佶寫刻本	不詳	《金陵生小言》:「丘南藏板本《堯峰文鈔》扉頁有牌記云:『本坊精選……唐少村無誤。』此即當時印書廣告語也。」㉞
28	《日知錄》	清康熙三十四（1695）年遂初堂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有「惜陰室藏書印」、「華□記號」諸印。

㉞ 蔣寅，《金陵生小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8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9	《五經大全》	清康熙三十五（1696）年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全書卷首扉頁二頁正面分別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當中另加有「少村」二篆字朱文小方印）。分冊中《書經大全》、《詩傳大全》、《春秋大全》、《禮記說義纂訂》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㉟
30	《天下名山記鈔》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序刊本	日本一橋大學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序唐氏興賢堂刊本」。
31	《三魚堂四書大全》	清康熙三十七（1698）年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郭明芳〈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繕寫原因考述〉著錄：「筆者曾見此版,書首有牌記，言：『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㊱
32	《四書朱子語類》	清康熙四十年（1701）南陽講習堂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有「信胤庫書」印記。
33	《儲遯菴文集》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恔」墨記。《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此扉頁並非原刻，當係後人從他處移來，訂在序文之前。」㊲ 有「蔣業晉」、「紹初」藏印（清乾隆年間人物），另有「中谷」、「華□記號」印記。

㉟ 該例引用見笠井直美，〈吳郡寶翰樓書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64期（2013），頁310。笠井直美，〈吳郡寶翰樓初探〉，《古今論衡》，27期（2015.4），頁109。

㊱ 郭明芳，〈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繕寫原因考述——兼談《四庫全書》捐書繕寫本〉，收入《中國四庫學》，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2020），頁144。

㊲ 沈津，《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4 集部》，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1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4	《有懷堂詩文集》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本	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清康熙四十二年興賢堂書鋪刻本」。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吳紱」、「方來」、「泊邨吳氏家藏」、「陽羨泊邨吳氏珍藏」、「泊邨」、「經庸」、「桂窗」、「神物當有訶護」諸印。
35	《居易錄》	清康熙四十四（1705）刻本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書前扉頁正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背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華□記號」印記。
36	《商丘宋氏家乘》	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仁井田博士遺愛」、「山本氏藏書」諸印。
37	《佩文齋廣群芳譜》	清康熙四十七（1708）年內府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華□記號」、「葭陽圖書」、「千如所藏」、「藤井里凌齋藏書」、「南葵文庫」諸印。
38	《陸堂詩學》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小瀛山閣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	《四庫存目標注》:「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三年小瀛山閣刻本，題『平湖陸奎勳聚緱著，受業周朱耒象益、李宗仁麟客仝校』。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白口，左右雙邊。封面刻『小瀛山閣藏板』，另有小牌子：『本坊精選……唐少村。』蓋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借陸氏家藏板印售者。」㊳有「飛青閣藏書印」(楊守敬)、「松坡圖書館藏」諸印。

㊳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 經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1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9	《新刻攝生總論秘授脈訣》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魏瑞昌刻本	日本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華□記號」、「三角氏圖書記」、「京都府圖書印」諸印。
40	《雙溪集》	清康熙五十七（1718）年婺源王氏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篁村島田氏家藏圖書」、「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南葵文庫」諸印。
41	《夢月巖詩集》	清雍正三年（1725）刻本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室棟書庫個人文庫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另有「寶泉」、「筠房」、「金生閣」、「華□記號」諸印。
42	《匠門書屋文集》	清雍正七年（1729）顧詒祿刻本	2021年中貿聖佳上海秋拍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43	《晚笑堂畫傳》	清乾隆間刻本	2009年泰和嘉成春拍	書前扉頁正面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
44	《四書翊註》	清乾隆四年（1739）光德堂刻本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華□記號）」、「秋月春風樓磯氏印」印記。
45	《王荊公詩箋注》	清乾隆六年（1741）張宗松清綺齋刻本	日本大阪公立大學 中百舌鳥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
46	《壯悔堂文集》	清乾隆十四年（1749）刻本	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47	《古周易訂詁》	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	日本秋田縣立圖書館（根本文庫）	高橋智〈根本通明先生藏書紀略〉著錄有「興賢堂書鋪唐少村」墨記。㊴

㊴ 高橋智，〈根本通明先生藏書紀略 —根本文庫研究之二—〉，《斯道文庫論集》，第39輯（2004），頁99-1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8	《尊聞錄》	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墨記。有「下毛石氏藏書記」印記。
49	《列女傳》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不足齋刻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
50	《經訓堂叢書》	清乾隆四十六（1781）至五十五年（1790）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部圖書室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有「隈山谷氏」、「千城」、「黑川氏圖書記」諸印。
51	《重校聖濟總錄》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鳴珂燕遠堂刻本	日本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小出文庫）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小出文庫」為小出氏園部藩舊藏本。
52	《詩緝》	清嘉慶十五年（1810）刻本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書前扉頁有「唐少村小影」肖像紅印、「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恨」墨記。有「島田氏雙桂樓收藏」、「南葵文庫」諸印。
53	《欽定明鑑》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	日本鹿兒島大學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興賢堂書鋪唐少村刊」。
54	《十七史》附《弘簡錄》	清道光間蘇州趙氏書業堂刻本	日本館林市立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書業堂趙氏覆刻汲古閣本，清書鋪唐少村後印。」
55	《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	清道光間怡古堂刻本	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清興賢堂書鋪刻本」。書前扉頁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墨記。怡古堂應是清代開封常茂徠（1787－1874）堂號，道光三十年（1850）刊刻過《增訂春秋世族源流圖考》六卷《春秋女譜》一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6	《江蘇詩徵》	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館方著錄為「道光元年（1821）序 儀徵阮元兩粵節署刊本 唐少村興賢堂書鋪藏板」。書前扉頁有背面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悞」墨記。有「華□記號」、「會津藩士山內熊之助藏書記」、「槐南詩料」、「森宝書」諸印。
57	《明儒學案》	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	書前扉頁有「本坊精選……唐少村無悞」墨記。有「觀生廬」（湯淺廉孫）印記。
58	《雞峰普濟方》	清道光八年（1828）長洲汪氏藝芸書舍覆宋刊本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許媛婷所撰《雞峰普濟方》解題：「然則，令人好奇的是，書前扉頁另有明嘉靖以迄崇禎年間金陵地區唐氏興賢堂書鋪的坊肆印記。此印向來被版本學界視為書坊宣傳印記，亦具有標示版權的意義。前葉有『先知我名……唐少村小影』，附戴笠手執書卷之半身人像朱記；後葉則為『本坊精選……唐少村無誤』墨印。明人印記鈐於清刊本扉頁之上，恐是書賈販賣，欲提高書價的偽訛手法。」㊵ 有「小島氏圖書記」、「葆素堂藏鷺人祕笏」、「尚質之印」、「尚質私印」、「寶素堂攷藏醫書之記」、「江戶小島氏八世醫師」、「醫

㊵ 宋兆霖，《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師臣尚質印」、「楊守敬印」、「宜都楊氏藏書記」、「星吾海外訪得祕笈」、「飛青閣藏書印」諸印。

從「表3」可以看到，通過對36家館藏單位、拍賣會及文獻記載的58種與唐少村相關書籍調查，㊶ 共計有明嘉靖刊本3部，明翻刻嘉靖本1部，萬曆刊本7部，崇禎刊本5部，清順治刻本2部，康熙刊本22部，雍正刊本2部，乾隆刊本9部，嘉慶刊本2部，道光刊本5部。所涉及的書籍刊刻出版時間上至明嘉靖四十年（1561），下至清道光八年（1828），延綿二百六十餘年。如果真有如此長久之坊肆，名聲應當顯赫如掃葉山房，出版的書籍品種也當極為豐富。而唐少村興賢堂寂寂無聞，僅有此肖像廣告為人說事，並且大部分論著只是沿用張秀民先生所舉《楚辭集解》一例，有違常理。

現存帶有唐少村廣告木記的書籍，明版有16部，清版有42部，以清刻本居多，其中帶明確刊年最晚的是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雞峰普濟方》。關於此書上的唐少村木記，過去學者有「唐少村興賢堂是明代書坊」這種先入為主的印象，或認為此木記為偽造。通過對比原印，這個木記與其他各書所見並無兩樣，應非出於偽造。若此書木記是偽造，那其他40餘部清刻本上的木記也同屬可疑。因此，《雞峰普濟方》一書還是可以作為我們判斷唐少村所處年代下限的一個重要例證。唐少村興賢堂出售此書的時間不可能早於此書出版時間，那麼就可以斷定唐氏興賢堂的年代下限至少到了清道光年間或更晚。

唐少村為清道光年間人物，在日本內閣文庫所藏《莊渠先生遺書》書上有更直接的證據。這部書的扉頁「唐少村小影」廣告旁有唐少村本人朱筆題記：

㊶ 日本佐野市立鄉土博物館藏《燕詒堂唐詩選》、佐賀縣立圖書館藏《御撰資治通鑒綱目三編》也著錄為「清興賢堂刊」，有可能也是帶有唐少村廣告的書籍。因未見原書及詳細著錄，暫不列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堀誠齋所集《諸家藏書印一覽》，有一從原書上挖下「唐少村小影」紅印，未詳從何書挖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 魏莊渠，歸震川先生之師也。此書是明江南省官刻本，而無翻板，現此書紳家舊藏之物，如要二部，決不易也。戊戌冬月，少村謹記。（圖6）

這段題記的主要目是推銷此書，大意是此書是故家舊藏的明代官版，沒有翻刻本，十分稀見，如果想要在坊間找到第二部，決非易事。從中我們可以解讀出如下三點信息。首先，唐少村稱此書的版本為「明江南省官刻本」，顯然不是明人口吻，必是清人或更晚。其次，唐少村稱「此書紳家舊藏之物」，說明他不是出版方，只是從舊家收來書籍。如是出版方，刷印一部很容易，就不會說「如要二部，決不易也」的話。第三，這則題記帶有「戊戌」的干支紀年，這是最關鍵的信息。根據前文分析，唐少村銷售過清道光八年（1828）刊刻的《雞峰普濟方》，其生活的年代必然在道光年間前後或以降，而這部《莊渠先生遺書》在唐少村寫完題記後就銷往日本，於道光二十年（1840）入藏昌平坂學問所（書上有「天保庚子」的入藏時間戳記），則題記的「戊戌」，是在1828年前後且在1840年前的某一年，與之相對應的只能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內閣文庫所藏舶載書目《購來書籍目錄》記載「戌五」番號的唐船1838年帶來「《魏莊渠集》一套」，[42] 應即唐少村寫下題記的這部，可知該書在同一年即銷往日本。綜合以上數點，可以證實唐少村是清道光間人物，絕非前人所謂明代。

四、廣告與牌記：唐少村興賢堂為銷售方非出版方

唐少村興賢堂之時代既已確定是清道光年間，而其所經營的書籍上至於明嘉靖、萬曆、崇禎年間，中跨清順治至道光年間。這些帶有唐氏木記的書與興賢堂是什麼關係，是作為出版方刷印出售？還是作為銷售方買入新舊書籍再行銷售？兩種不同的經營方式，關涉到這個廣告能否作為出版方的牌記著錄。從唐氏的廣告語上看，「委辦諸書，專選善本」、「本坊精選新舊足冊好板書

---

[42] 大庭脩，〈內閣文庫の購來書籍目錄〉，《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1輯（1968.3），頁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籍，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都表明唐氏興賢堂只是一個經營書鋪，買入新舊書籍出售，且保證所售的都是足本，若有殘缺，還承諾可以上門來退換。從廣告語字面意思來看，唐少村興賢堂是清道光年間的一家經營新舊書籍的書鋪，這比前人認為它是一家書坊更為合理。

然而前人著錄此木記，常當作牌記，或著錄作「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刻本」，或謂「此戳不常見，蓋明坊本也」、㊸「此即當時印書廣告語也」。㊹就情理而言，帶有唐氏木記的書籍倘若都是該坊所刷印，則一個道光年間的書坊，所獲得的書版時代從明嘉靖至清道光，跨度太大，現實中不大可能做到。具體到單個的例子，也可以提出反證。如前文提到的明萬曆本《楚辭集解》，浙江圖書館所藏帶唐少村木記者，為汪氏家刻初印本，校刊者的墨釘尚未補刻。在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這套書版已經汪瑗侄子汪仲弘改版重印，將未刻的墨釘補刻為「侄仲弘補輯」。到了清道光年間，唐少村興賢堂即便是獲得明萬曆年間的書版，也不可能刷印出1618年剜改前的初版印本。實際情況應是興賢堂買入明萬曆初印本舊書，書鋪加襯了扉頁，蓋上廣告，再予出售。對比《楚辭集解》原書實物，更容易證實這一點。浙江圖書館藏《楚辭集解》一書經過改裝，扉頁印有唐少村興賢堂木記者是加襯的一頁，為清代晚期常見的黃竹紙，與原書明代紙張明顯不同。

其他各書，也找不出其出版發行與唐少村興賢堂有關的直接證據，應該同是由唐少村買入新舊書籍再出售。明刊本《念菴羅先生集》、《翠翠集》、《詩法》、《程氏墨苑》、《葛一龍集》等與清道光年間相去甚遠，書版存世可能性較低。《莊渠先生遺書》書上有唐少村親筆題記，明確提到這書是「明江南省官刻本」、「紳家舊藏之物」，是唐少村從故家收來的舊書，並非興賢堂刷印出版。清康熙刻本汪琬《堯峰文鈔》為「丘南藏板」，即清康熙間汪氏丘南書屋藏板，為門人侯官林佶手寫上版，吳郡程際生刻板。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刻本《陸堂詩學》為「小瀛山閣藏板」，距道光也已近百年之久。清道光八年（1828）刻本《雞峰普濟方》為汪士鐘「藝芸書舍藏版」，時代相

㊸ 徐乃昌，《積學齋藏書記》，頁231。
㊹ 蔣寅，《金陵生小言》，頁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不排除存在購借版片刷印的可能。但除了這方廣告木記之外，沒有其他證據表明是唐少村刷印。並且與《楚辭集解》一樣，《雞峰普濟方》蓋有唐少村木記的扉頁，是加襯的白紙，與原本印書黃竹紙不同，唐少村木記應非印刷時所加，而是書鋪出售時重裝所加（圖7）。因此，唐少村興賢堂都不是這些書籍的出版方。更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調查現存相關書籍，沒有發現任何一種書存在帶有唐少村興賢堂「牌記」的副本，如果唐少村刊刻或者經手過這些書版，刷印的應不止一套，存世肯定還有其他的副本，但目前為止沒有發現其中任何一件。綜合以上數點來看，這些書籍都是唐少村收進再出售的書籍。

過去學者常常為此「牌記」所迷惑，將之誤認為出版方的書坊，由此對唐少村興賢堂所處的年代產生了誤判。如郭明芳先生舉證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三魚堂四書大全》一書，認為是「寶瀚樓第二次刊本，其書版在雍正乾隆時流落金陵興賢堂」、[45]「唐少村書肆除刻書外，亦有收購舊版刷印」，[46] 並據此推斷興賢堂從明萬曆延續到太平天國時期，而這一說法的根據同樣是基於對著錄為興賢堂書籍的目錄學調查：「興賢書堂起於萬曆年間金陵書肆，肆主為唐少村，其與萬曆間金陵唐少橋書肆應有關係。崇禎間仍續有營業，美國會館藏《葛一龍集》作明崇禎間唐少村興賢書鋪刊本。清初仍有營業，應於太平天國時結束營業。刻書有《繡像漢宋奇書》、《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詩法》十卷、《十七史》（得自蘇州書業堂趙氏覆刻汲古閣本）、《天下名山記鈔》十六卷、《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欽定明鑑》二十四卷、《燕詒堂唐詩選》、《（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現知所刊書，最晚至道光間，如《江蘇詩徵》一百八十三卷與天津圖書館有黃濬纂修《〔道光〕萍鄉縣誌》十六卷10冊著錄『清道光三年（1823）興賢堂刻本』。」[47] 研究者在過去大多被「書坊購借版片刷印改易牌記」這種

[45] 郭明芳，〈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繕寫原因考述——兼談《四庫全書》捐書繕寫本〉，頁144。

[46] 郭明芳，〈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18期（2017.6），頁9。

[47] 郭明芳，〈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頁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思維定勢所誘導，以此解釋書上的唐少村木記。但從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書坊延續近三百年不間斷地出版發行書籍，抑或數百年間書版大量存世，二者的可能性都比較低，用傳統的「書坊購借版片刷印改易牌記」這種模式來闡釋這個例子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以上舉證諸例，也有部分與唐少村興賢堂無涉，如《繡像漢宋奇書》有「金陵興賢堂梓行」字樣，實際並非唐少村興賢堂。類似的還有「星源遊氏興賢堂」，刊刻過《還帶記》、《伍倫全備忠孝記》等書，牌記有「星源遊氏興賢堂重訂，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字樣。天津圖書館藏清道光三年刻本《萍鄉縣志》，牌記有「興賢堂庋板」字樣，書上沒有與唐少村相關的廣告牌記，也是另一興賢堂。因為「金陵」、「興賢堂」、「唐氏」等字眼的巧合，而前人又將「唐少村興賢堂」與萬曆年間書坊「金陵唐少橋」混淆，三者名號在過去往往也糾蓼不清。目前所見各類論著中，只有芳村弘道先生為《聖濟總錄》所撰解題文字對該廣告的性質作出了準確的判斷，芳村先生舉證《楚辭集解》、《葛一龍集》及日藏《十三經註疏》的例子，認為這是一個商品宣傳廣告，並非牌記。[48]

由此可見，唐少村興賢堂是清道光年間的一間書鋪，出售新舊書籍，且具有很強的經營宣傳意識，在經銷的書前，蓋上「唐少村小影」肖像廣告和「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品質擔保聲明。可能會有人質疑：唐少村在每種書上加蓋廣告，豈不是汙損圖書，影響銷路。事實上，唐少村的兩個印記都是鈐印在書籍前空白扉頁的正背兩面，這張空白扉頁大多是加襯上去的，一般不存在汙損原書的問題。倘若購書者覺得這一葉廣告不雅馴，撤去即可，對原書並無影響。

唐少村興賢堂既可證明為經營書鋪而非出版書坊，則過去為此印記所迷惑，誤認作牌記的版本著錄，皆應改正。南京圖書館所藏《念菴羅先生集》是近年拍賣的過雲樓舊藏，拍賣時著錄誤將唐少村興賢堂當作牌記著錄，著錄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唐少村興賢堂刻本」，後來出版《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訂正為「嘉靖四十二年（1563）刻本」，且注明「是書扉頁有唐少

[48] 芳村弘道、鈴木俊哉，《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藏小出文庫漢籍古書分類目錄》（南丹：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2012），頁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村興賢堂題記」，[49] 此書版本實際是明嘉靖四十三年刻本。[50] 日本內閣文庫藏《梅禹金詩草》，《中國古籍總目》著錄為「明萬曆十一年興賢堂書鋪刻本」。[51] 此本已影印入《四庫存目叢書補編》，影印本著錄為「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十一年刻本」。[52] 通過對比書影可知，此書與《總目》著錄的另一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一年宣城梅氏鹿裘石室刻本」同版，版心都有「鹿裘石室」字樣，同為梅氏家刻本。內閣文庫藏本因書前扉頁帶上了唐氏興賢堂的木記，故被當作興賢堂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葛一龍集》十四種，著錄作「明末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刻本」，[53] 也是誤認唐氏木記作牌記。此書實則可算是個私人著述叢書，當中包含了多種著作，刊刻時間不一。《中國古籍總目》著錄作「明崇禎間刻本」，[54] 較為合理。其他各例，也應依據原書版本逐一加以訂正。

因此，以上書籍卷端扉頁有唐少村興賢堂的書鋪廣告，在著錄時被誤認為版本牌記。這些條目只可以算是「清唐少村興賢堂營業書目」，不能當作「出版書目」。唐少村興賢堂只是銷售方，不可著錄為版本中的出版方。

五、蘇州書鋪與漢籍外銷：東亞書籍傳播史視角的唐少村興賢堂

前人認為唐少村是明金陵書坊係出於誤解，那麼關於唐少村興賢堂具體所

---

[49] 陳海燕、葉建成，《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頁229。

[50] 《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89冊影印有此書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嘉靖四十二年刻本，對比過雲樓書影，二者有出入。北大藏嘉靖四十二年刻本書前有嘉靖四十二年（癸亥）滁陽胡松序，版心為白魚尾。過雲樓舊藏本版心為黑魚尾，實則為嘉靖四十三年重刻嘉靖四十二年本，書前有嘉靖四十三年（甲子）俞憲〈重刻羅念菴先生文集敘〉。

[51]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836。

[52] （明）梅鼎祚，《梅禹金詩草》，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5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頁469。

[53] 范邦瑾，《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頁296。

[54]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第2冊，頁879。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在，我們也可以根據現存唐少村經手書籍的調查結果作出一些分析，從書籍傳播史的角度證實它是清道光年間蘇州的一個書鋪，並稽考出一段漢籍外銷的隱藏史實，進一步推證這個廣告可能是一個「外銷廣告」。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帶唐少村廣告的書籍流入日本的數量特別多，58例中可確考曾流入日本的有52部（收藏於日本公私收藏機構者有38部，[55]清末回流中國者4部，其他地區館藏從日本購入者5部，近年拍賣會日本回流者5部），另有3部疑似從日本購入，[56]剩下3部待考。[57]包括非日本境內收藏的例子，大多都是輾轉再次從日本購入。如可確考為清末從日本回流到中國的有4例，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雞峰普濟方》，是楊守敬清末在日本所得，書上有日本江戶末幕府醫官小島尚質的藏印。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陸堂詩學》，有楊守敬「飛青閣藏書印」，應也是清末在日本購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翌翌集》，原為徐承祖（字孫麒）舊藏，徐承祖曾任駐日公使，書上有其藏印「孫麒氏使東所得」，為其在日本所購。南京圖書館藏《念菴羅先生集》（過雲樓舊藏），書上有「金生閣」等印，唐少村經手帶有此印的書籍不少，此印亦見於《陸堂詩學》、《翌翌集》，皆清末日本回流漢籍。北美從日本購入可考者有5例，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居易錄》，書上首頁有鉛筆所記「Oct 14 1965 YAMAMOTO ￥20000 12vol」。「YAMAMOTO」是日本姓氏「山本」的羅馬音，即神保町山本書店代稱，可知是該館1965年10月14日以2萬日元價格從山本書店購入。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尊聞錄》，有日人藏印「下毛石井氏藏書記」，1960年入藏。《儲遯菴文集》有日人印記「中

[55] 其中《佩文齋書畫譜》見於東京古典會2019年入札會，未詳去向，暫歸為日本收藏一類。

[56]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三魚堂四書大全》筆者未見原書，據郭明芳描述著錄，未詳入藏時間。美國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壯悔堂文集》未查到入藏時間。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有懷堂詩文集》也未查到入藏時間，書上僅有吳綋（1693－1748）藏印，無清乾隆以下藏印。這三部可能也都是從日本購入書籍。

[57] 待考3例分別為：《楚辭集解》（浙江圖書館藏）、《堯峰文鈔》（據蔣寅先生所述著錄，不詳藏地）、《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谷」及「華□記號」戳記，1960年入藏，其中「華□記號」（圖8）[58] 亦見於唐少村經手的其他十餘部書上。《四書朱子語類》有日人藏印「信胤庫書」，1955年入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葛一龍集》是1950年入藏。這幾部應該都是1950年代以後從日本購入書籍。其他北美、新加坡所藏各書如果逐一追查其傳入路徑，可能還會有類似的結果。近年中國拍賣市場出現的帶唐少村廣告書籍，大多也是從日本回流。如《東坡先生全集》、《唐宋八大家文鈔》書上有日人藏印，《升菴先生群書麗句》等首見於日本拍賣會，這些都是從日本回流到中國的古籍。這些帶有唐少村廣告的書籍輸入日本，有兩種可能，一是唐少村直接通過同時代的唐船商人銷往日本，一是有人偶然將唐少村銷售過的書賣到日本。那麼，那種可能性更大呢？我們可以根據前面調查結果略作分析。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日本現藏各書的輸入時間。日本內閣文庫所藏的《庸行編》、《莊渠先生遺書》、《梅禹金詩草》是昌平坂學問所舊藏，有明確的入藏時間戳記，結合舶載書目所記錄漢籍輸入時間，可為我們推斷以上各書傳入日本的時間提供依據。如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庸行編》一書，日本學者大庭脩先生根據舶載書籍元帳記載，證實該書是在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輸入，[59] 當清道光二十年。原書鈐有「天保壬寅」、「昌平坂學問所」諸印，可知在天保十三年（1842）入藏昌平坂學問所。而根據《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記載，通過唐船將這部書攜入日本的商人是「辛大」，同「子一」號船的還有劉念國、沈耘穀二人，同年「子二」、「子三」號船有王雲帆、邵植齋、鄭行攀等人，次年「丑一」、「丑二」、「丑三」號船

[58] 參見青裳堂書店，〈藏書印譜3〉，《書誌學月報》，第14號（1984.1），頁16。〈藏書印譜3〉對印章未作釋文，根據印面看應為「華□記號」四字朱橢圓印，日本各大圖書館有釋讀為「萬記子」、「榮庇記號」、「榮府記號」者。其第二字未能確定，暫作闕疑，用「□」表示。〈藏書印譜3〉謂此印為明治維新以前長崎海關檢查唐本後所鈐戳記（主要檢查有無基督教禁書），但並非所有唐船舶來漢籍都鈐有該印，此印可能是唐船商人商號戳記。

[59] 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337。《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江戶後期寫本）第十一冊「子一二三丑六寅三番船卯一亥五六七八番船書籍元帳」中「子壹番船」條目中記載此書去向是「學問所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楊少棠、沈萍香、趙福等人。據日本學者松浦章所考，辛大在天保六年（1835）「未四」號船身份是水手，劉念國是《巴旦國漂流記》中記載的天保二年（1831）以寧波船總管身份來通航的商人。[60] 同時，我們在清道光十年（1830）蘇州《重修三山會館捐款人姓名碑》中發現有劉念國捐款記錄，捐款名單中將其歸入「洋幫」，[61] 可知劉念國是往來蘇州與長崎的商人。碑文中同列「洋幫」的還有鄭行攀、[62] 鄭資淳（長樂人）[63] 等人，均是當時居留蘇州的福州籍長崎貿易船之船員，以總管身分管理船中水手事務，長期在蘇州就近採購書籍等商品進行貿易。又明嘉靖刻本《莊渠先生遺書》一書，卷端有唐少村清道光十八年（1838）題記，《購來書籍目錄》載其輸入時間為同一年，[64] 原書卷末有「天保庚子」的入藏木戳，即天保十一年（1840）入藏昌平坂學問所。明萬曆刻本《梅禹金詩草》一書，《購來書籍目錄》載其輸入時間為1837年，[65] 原書卷末有「天保庚子」的入藏木戳，可知是天保十一年（1840）入藏。除了上述三部書以外，據《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記載，1840年辛大同時帶來的還有《楚辭集解》、《繪事備考》等書，或許就是上文「表3」所著錄帶唐少村廣告的幾部。由劉念國、沈耘穀、王雲帆、邵植齋等帶來的漢籍還有

---

[60] 與劉念國、辛大同船及同年唐船其他各人身份，松浦章先生也有考證：「有關其他幾人，長崎縣立圖書館藏《割符留賬》的記載可對號入座。『沈耘記』是天保十一年（1840）子一號船僑居長崎船主、天保十二年（1841）丑二號船僑居長崎船主沈耘穀；『王雲記』是天保十一年（1840）子二號船船主王雲帆；『邵植記』是天保十一年（1840）子三號船船主邵植齋；『楊少記』是天保十二年（1841）丑一號船代船主楊少棠；『沈萍記』是同年丑二號船財副沈萍香；『趙福記』則是見於《東航記聞》卷2所記天保十四年（1843）卯五號船船員趙福。」松浦章著，李小林譯，《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頁118-119。

[61] 江蘇省博物館編，《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頁356。

[62] 《豐利船日記備查》中有鄭行攀記載，見松浦章編著，卞鳳奎編譯，《清代帆船東亞航運史料彙編》（臺北：樂學書局，2007），頁214-215。

[63] 《通航一覽續輯》卷三十六中有鄭資淳之記載，見松浦章著，李小林譯，《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上，頁290。

[64] 大庭脩，〈內閣文庫の購來書籍目錄〉，頁69。

[65] 大庭脩，〈內閣文庫の購來書籍目錄〉，頁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蘇詩徵》、《東坡全集》、《唐宋八大家文鈔》、《四書翊註》、《徵吾錄》、《近思錄集解》、《居易錄》、《升菴先生群書麗句》、《日知錄》、《佩文齋書畫譜》、《經訓堂叢書》等。[66]

舶載書目一般只簡單著錄書名、卷數、部數套數，鮮有記錄版本信息。僅憑書名相同，難以明確舶載書目所著錄者是即「表3」調查到帶唐少村廣告的一部。但上文所舉昌平坂學問所舊藏三部帶有明確的入藏時間戳，與其傳入日本時間相去不過兩三年，則舶載書目著錄者與現藏本為同一部書的可信度較高。其他各書由於沒有明確的日本最早入藏時間，原本是難以判斷二者是否為同一書。但基於上文舉例分析，我們發現唐少村經銷書籍可能存在集中輸入的現象，因此可以根據舶載書目對其他流入日本的唐少村經銷書籍作一個大致的時間範圍調查。

我們選擇與唐少村興賢堂營業時間相近的日本天保至弘化年間的舶載書目，主要有《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江戶後期寫本，記載1839－1854年間的輸入漢籍），[67]《購來書籍目錄》（內閣文庫藏寫本，為日本學者根據舶載書目按書名音序重編的價格目錄，記載了1835－1844年間輸入漢籍）。[68] 兩部舶載書目可考察1835－1854年間漢籍輸入日本情況，與唐少村1838年尚在經營的時間比較接近。將「表3」中曾傳入過日本的唐少村興賢堂經手書籍（包括日本收藏、清末回流中國、近年拍賣回流中國、其他地區從日本購入者）52部與之對比，列舉如次：

[66] 佚名，《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江戶後期寫本）。

[67] 另參考大庭脩先生據長崎縣立長崎圖書館藏本整理本及索引。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頁453-576。

[68] 有大庭脩先生整理本。大庭脩，〈內閣文庫の購來書籍目錄〉，頁33–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4 唐少村經銷書籍輸入日本時間一覽表

序號	傳入時間	唐船番號	舶載書目著錄	表3編號	書名	版本	館藏/出處	分類
1	1838	戊五	《魏莊渠集》	1	《莊渠先生遺書》	明嘉靖四十年（1561）序刊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日藏
2	（1835－1836）	臨時	《羅念菴集》	2	《念菴羅先生集》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刻本	南京圖書館	清末回流
3	1837、1839	酉六、亥六	《閑闢錄》	3	《閑闢錄》	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程纘洛刻本	日本筑波大學附屬圖書館中央圖書館	日藏
4	1841	丑二（沈耘記）	《徵吾錄》	4	《鄭端簡公徵吾錄》	明翻刻本嘉靖四十五年（1566）以降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日藏
5	（1835－1836）、1837、1839	臨時、酉三、酉六、亥二、亥六、亥八	《方氏墨譜》	5	《方氏墨譜》	明萬曆間刻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日藏
6	1837	酉一	《梅禹全集》㊾	6	《梅禹金詩草》	明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日藏
7	（1835－1836）	臨時	《翠翠閣集》	7	《翠翠集》	明萬曆十五年（1587）序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徐承祖清末使東所得）	清末回流

㊾「全」當為「金」字之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8	1838	戊五	《詩法大成》⑦⓪	8	《詩法》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序刊本	日本九州大學圖書館	日藏
9	（1835－1836）、1837	臨時、酉八	《程君房墨苑》	9	《程氏墨苑》	明萬曆三十三（1605）年刻本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日藏
10	（1835－1836）、1838－1840、1842、1844、1846、1849、1850	臨時、戌一、亥六、子一（劉念國）、寅四、辰五、午二、己酉三、庚戌四	《東坡全集》	10	《東坡先生全集》	明萬曆三十四（1606）年刻本	2014年泰和嘉成春季拍賣會	近年拍賣回流
11	（1835－1836）	臨時	《尺木齋小集》⑦①	12	《葛一龍集》	明崇禎間刻本	美國國會圖書館	購自日本
12	1841	丑二（沈耘記）	《楊升菴群書麗句》	13	《升菴先生群書麗句》、《翰林秘授新題纂組》	明崇禎間刻本	2021年4月京都祇園會春季拍賣會 2021年6月北京榮寶春季拍賣會	近年拍賣回流

⑦⓪ 謝天瑞《詩法》，又名《詩法大全》。

⑦① 《葛一龍集》十四種，含《尺木齋詩選》、《鷓鴣集》、《佛客齋集》、《滇茶百韻詩》、《新詩》、《索解草》、《旅聲》、《筑語》、《弄閒草》、《脩竹編》、《獨往篇》、《豔雪篇》、《矯褐吟》、《新綠齋》，舶載書目殆據卷首《尺木齋詩選》著錄。

臺灣大學圖書館

13	1839、1840、1851、1852	亥六、子一（劉念國）、辛亥一、壬子二	《唐宋八大家文》	14	《唐宋八大家文鈔》	明崇禎間刻本	2013年上海工美春季拍賣會	近年拍賣回流
14	1837、1839、1846、1849、1851	酉三、亥二、亥五、亥六、午四、己酉三、辛亥四	《十三經註疏》	15	《十三經註疏》	明崇禎間汲古閣刻本	日本姬路文學館	日藏
15	1836	申三	《畫史會要》	16	《畫史會要》	明崇禎四年（1631）序刊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藏
16	1837、1839、1843	酉二、亥六、卯二	《本草彙言》	17	《本草彙言》	清順治二年（1645）大成齋刻本	日本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	日藏
17	1838、1839、1841、1843	戌五、亥六、丑二（沈耘記）、卯五	《近思錄集解》	18	《近思錄集解》	清順治康熙間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18	1836、1839、1840、1843、1844、1846—1848、1850	申八、亥二、亥四、亥六、子一（王雲記）、卯二、卯五、辰四五六七、午五、丁未二、戊申二、庚戌四（《書畫譜》）	《佩文齋書畫譜》、《欽定書畫譜》	19	《佩文齋書畫譜》	清康熙間內府刻本	日本東京古典會2019年入札會	日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	1837	酉一	《中晚唐詩選》	20	《中晚唐詩紀》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立命館大學（高木文庫）	日藏
20	1839、1841	亥二、丑二（沈耘記）	《香祖筆記》	21	《香祖筆記》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岩國徵古館	日藏
21	1836－1840	申三、酉五、戌四、亥六、子二（王雲記）	《廣東新語》	22	《廣東新語》	清康熙間刻本	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	日藏
22	1841	丑二（沈耘記）	《古今治平略》	23	《訂補古今治平略》	清康熙三年（1664）序刊本（卓觀堂）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23	1836、1839	申三、亥三	《日講易經解義》	24	《日講易經解義》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	日本大阪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24	1840	子一（辛大記）	《庸行編》	25	《庸行編》	清康熙三十年（1691）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日藏
25	1837、1840	酉八、子一（辛大記）	《繪事備考》	26	《繪事備考》	清康熙三十年（1691）金閶大雅五雅堂刻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藏
26	（1835－1836）、1836－1841、1843－1846、1848、1849、1851	臨時、申四、酉三、酉六、戌一、戌四五、亥六、子一	《日知錄》	28	《日知錄》	清康熙三十四（1695）年遂初堂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辛大記）、子二（王雲記小本）、丑二（沈耘記）、卯二、辰四五六七、巳三四五、午二、午四、午七、戌申四、己酉六、辛亥一、辛亥四						
27	1837	酉一、酉六	《五經大全》	29	《五經大全》	清康熙三十五（1696）年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日藏
28	（1835－1836）	臨時	《天下名山記》	30	《天下名山記鈔》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序刊本	日本一橋大學圖書館	日藏
29	1837、1839、1844	酉一、亥六、辰四五六七	《四書語類》	32	《四書朱子語類》	清康熙四十年（1701）南陽講習堂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購自日本
30	1838	戌五	《儲遯菴集》	33	《儲遯菴文集》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購自日本
31	1836、1837、1839－1841	申三、酉一、酉五、亥二、子一（劉念國）、子	《居易錄》	35	《居易錄》	清康熙四十四（1705）刻本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1965年購自日本山本書店）	購自日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王雲記）、丑二（沈耘記）						
32	（1835－1836）	臨時	《宋氏家乘》	36	《商丘宋氏家乘》	清康熙四十四（1705）年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日藏
33	（1835－1836）、1836－1840、1842－1844、1848、1849、1854	臨時、申六、酉三、酉八、戌五、亥六七八、子三（鄭行記）、寅四、卯二、卯五、辰四、戌申二、己酉四、己酉五、己酉六、甲寅一	《佩文齋群芳譜》、《廣群芳譜》（佩文齋）	37	《佩文齋廣群芳譜》	清康熙四十七（1708）年內府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34	1839、1846	亥四、亥六、午二	《陸堂詩學》	38	《陸堂詩學》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小瀛山閣刻本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楊守敬清末使東所得）	清末回流
35	1841	丑二（沈耘記）	《攝生總妙方》（存疑）	39	《新刻攝生總論秘授脈訣》	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魏瑞昌刻本	日本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	日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6	1837	酉一	《王雙溪集》	40	《雙溪集》	清康熙五十七（1718）年婺源王氏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37	1838	戌五	《夢月岸詩集》⑫	41	《夢月巖詩集》	清雍正三年（1725）刻本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研究室棟書庫個人文庫	日藏
38	1837、1839	酉八、亥六	《匠門書屋》、《張匠門集》	42	《匠門書屋文集》	清雍正七年顧詒祿刻本	2021年中貿聖佳上海秋拍	近年拍賣回流
39	（1835－1836）、1836－1839、1849	臨時、申四、酉三、酉六、戌一、戌三、亥三四、己酉四、己酉五	《晚笑堂畫譜》	43	《晚笑堂畫傳》	清乾隆間刻本	2009年泰和嘉成春拍	近年拍賣回流
40	1841	丑二（沈耘記）	《四書翊註》	44	《四書翊註》	清乾隆四年（1739）光德堂刻本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日藏
41	1836、1837	申八、酉一	《王荊公詩集》	45	《王荊公詩箋注》	清乾隆六年（1741）張宗松清綺齋刻本	日本大阪公立大學 中百舌鳥圖書館	日藏

⑫「岸」當為「巖」字之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2	1836－1839	申四、酉三、戌三、亥一	《周易訂詁》（大本硃批）	47	《古周易訂詁》	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溪邑文林堂朱墨套印本	日本秋田縣立圖書館（根本文庫）	日藏
43	1839	亥六	《尊聞錄》	48	《尊聞錄》	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	購自日本
44	1839	亥六	《列女傳》繡像鮑刻	49	《列女傳》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知不足齋刻本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日藏
45	1840、1841、1846	子三（邵植記）、丑一（楊耀記）、丑二（沈耘記）、午二	《經訓堂叢書》	50	《經訓堂叢書》	清乾隆四十六（1781）至五十五年（1790）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部圖書室	日藏
46	1837、1839、1841、1844	酉三、亥六、丑二（沈耘記）、辰四五六七	《聖濟總錄》	51	《重校聖濟總錄》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鳴珂燕遠堂刻本	日本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小出文庫）	日藏
47	（1835－1836）、1837、1843、1845	臨時、酉三、卯二、卯四、巳三四五	《嚴氏詩緝》	52	《詩緝》	清嘉慶十五年（1810）刻本	日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日藏
48	1837－1839	酉二、酉八、戌五、亥一二五、亥六七	《欽定明鑑》	53	《欽定明鑑》	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刻本	日本鹿兒島大學圖書館	日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9	1836、1839	申八、亥五	道光版《十七史》《弘簡錄》附㉝	54	《十七史》附《弘簡錄》	清道光間蘇州趙氏書業堂刻本	日本館林市立圖書館	日藏
50	1838－1840	戌一、亥六、子一（劉念國）	《江蘇詩徵》	56	《江蘇詩徵》	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	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	日藏
51	（1835－1836）、1836－1840、1843、1844、1846、1849、1850	臨時、申四、申六、酉一、酉二、戌一、亥二五六七、子一（沈耘記）、卯五、辰二五、午五、午六、己酉三、己酉五、庚戌四	《明儒學案》	57	《明儒學案》	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	日藏
52	1836、1837、1839	申三、酉三、亥六	《雞峰普濟方》	58	《雞峰普濟方》	清道光八年（1828）長洲汪氏藝芸書舍覆宋刊本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楊守敬清末使東所得）	清末回流

說明：唐船番號使用當年干支的地支作為編號，各編號分別對應年份如次：未（乙未1835）、申（丙申1836）、酉（丁酉1837）、戌（戊戌1838）、亥（己亥1839）、

㉝ 「弘」字原避清諱作「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庚子1840）、丑（辛丑1841）、寅（壬寅1842）、卯（癸卯1843）、辰（甲辰1844）、巳（乙巳1845）、午（丙午1846）。《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所載1846年以後唐船番號地支與前者重複，容易混淆，則表中以完整干支記錄，包括：丁未（1847）、戊申（1848）、己酉（1849）、庚戌（1850）、辛亥（1851）、壬子（1852）、甲寅（1854）。「臨時」據大庭脩先生說，臨時船在《購來書籍目錄》價目中排在最前面，年份最早，可視為乙未年或丙申年來船，以（1835－1836）為其範圍。⑭ 表中著錄以《購來書籍目錄》為主，其所未備者則據《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補入。《元帳》記有商人「某某記」者，則以括號附註番號之末。

由「表4」的結果可見，我們幾乎找到了52種書的全部記錄，只有《新刻攝生總論秘授脈訣》一種不大確定，《購來書籍目錄》、《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著錄有「《攝生總妙方》二套」，此書為1841年沈耘穀帶來，未詳此條是《攝生總論》抑或《攝生眾妙方》筆誤。此外，疑似由日本購入的3種也能查到傳入日本的記錄。⑮「表4」中部分書籍有同名書多次輸入的記錄，具體是哪一次難以確考，根據舶載書目可提供一個大致的時間範圍。有的條目記錄有簡略的版本信息，則可以展開比較細緻的考察，如《購來書籍目錄》著錄1836或1839年輸入的「道光版《十七史》《弘簡錄》附 四十八套」，與日本館林市立圖書館藏《十七史》附《弘簡錄》版本相同。1839年輸入的《列女傳》，書目注有「繡像鮑刻」四字，即鮑廷博知不足齋刻本，與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列女傳》版本相同。另舶載書目偶有記錄冊數者，如《日講易經解義》二套十八本，大阪大學總合圖書館藏本也是十八冊，與之相符。這些例子可以佐證「表4」所列時間的可信度。

根據上述時間記載，可以還原出以下事實：清道光八年（1828）汪士鐘

⑭ 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頁149-150。

⑮ 疑似的3部《有懷堂詩文集》、《壯悔堂文集》、《三魚堂四書大全》，也能在舶載書目中查到相關同名書記錄：「《有懷堂詩文集》乙套」，為「臨時」唐船舶來，時間段為1835－1836。「《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套」，舶來部數較多，有「臨時、酉一、戌四、亥三、亥六、子一（劉念國）、子一（辛大記）、丑二、卯二、卯五、午一、午七、丁未二、丁未四」，時間段為1835－1841、1843、1846、1847。「《壯悔堂全集》二套」，有「臨時、申三四、酉三、酉八、亥二、子三（邵植記）、丑一（楊耀記）」，時間段為1835－1837、1839－18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藝芸書舍《雞峰普濟方》一書刊行後，唐少村經手過一種，書上蓋上了肖像廣告，在1836－1839年間銷往了日本。清道光十五、六年間（1835－1836）由臨時船帶來唐少村書鋪的《念菴羅先生集》、《葛一龍集》、《商丘宋氏家乘》、《天下名山記鈔》、《翌翌集》等書。清道光十六年（1836）唐船帶來《畫史會要》等。清道光十七年（1837），唐少村將一部《梅禹金詩草》銷往日本，於1840年入藏昌平坂學問所，同年唐船帶來的還有《雙溪集》、《中唐詩紀》等。清道光十八年（1838），唐少村在《莊渠先生遺書》寫下題記並蓋上肖像廣告，同一年將此書銷往日本，於1840年入藏昌平坂學問所，同年唐船帶來的還有《詩法》、《儲遯菴文集》、《夢月巖詩集》等。清道光十九年（1839），唐少村經手的鮑刻《列女傳》銷往日本，同一年帶來的還有《尊聞錄》等，道光版《十七史》也可能是此年帶來。清道光二十年（1840），往來於蘇州與長崎的商人將一套帶有唐少村肖像廣告的《庸行編》帶來日本，於1842年入藏昌平坂學問所，同船帶來的可能還有《江蘇詩徵》、《東坡全集》、《唐宋八大家文鈔》等書。這幾部書銷往日本的時間相去不遠，而此時唐少村興賢堂書鋪還在營業中，應是辛大、劉念國、沈耘穀等唐船商人直接從其書鋪帶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沈耘穀帶來《升菴先生群書麗句》、《訂補古今治平略》、《四書翊註》、《徵吾錄》等書。除了單一輸入記錄的例子外，「表4」中所記錄輸入時間比較確定的例子還有1836或1839年輸入的《日講易經解義》，1837或1839年輸入的《閑闢錄》，1837或1840年輸入的《繪事備考》。其他各書輸入時間也在1835－1854年間舶載書目中找到相關記錄。如果要更精確的推測，以僅有單一輸入記錄的書籍看，則主要集中在1835－1841年。

從銷往日本書籍的數量來看，如果是唐船商人偶然將帶有唐少村廣告的書籍帶到日本，則日本存藏的數量應不會如此之多，並且輸入日本的時間也不會這麼集中。1835－1841年間歷年都有可確認是唐少村興賢堂經銷的漢籍輸入日本，可見唐船商人與唐少村興賢堂書鋪是長期合作關係，唐少村也應瞭解這些「洋幫」商人的真實身份，知曉他們從店中購置的書籍是銷往日本。通過對上述書籍傳入日本的情況分析，可以認為唐船商人與之有著直接的貿易關係，唐少村興賢堂書鋪的書籍是直接通過唐船銷往日本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江戶時期日本漢籍主要通過長崎輸入，而當時江浙與長崎有頻繁的貿易往來。據大庭脩先生研究，江戶時期與日本長崎貿易往來主要是福州與江浙的唐船，在清康熙以後，江浙的唐船超過了福建船，成為長崎貿易的主力，而漢籍主要通過江浙的唐船輸入日本。⑯ 朝鮮燕行使者李德懋（1741－1793）曾對此感慨道：「近者江南之籍，輻湊於長崎，家家讀書，人人操觚，夷風漸變。」⑰ 江浙一帶與長崎往來非常密切，如長崎奉行中川忠英所編《清俗紀聞》所記錄的是江浙語音及風俗，清道光年間蘇州顧祿所撰記錄姑蘇風俗的《清嘉錄》一書刊行後不久在日本廣為流行，並在當地翻刻。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江浙、尤其是蘇州與長崎之間文化、貿易交流之頻繁。清朝後期蘇州也是全國的刻書中心，各地銷售的書籍都打上「姑蘇原本」的廣告，以示版本精良。唐少村銷售過的一些書籍如寶翰樓藏版《天下名山記鈔》、《三魚堂四書大全》以及汪氏藝芸書舍藏版《雞峰普濟方》等都是蘇州刻本，而將唐少村鋪中《庸行編》等書帶來日本的辛大、劉念國等人是往來於長崎與蘇州的商人，興賢堂或許就是蘇州當地眾多書鋪中的一間。順著這一思路查閱資料，清道光年間蘇州的確有一間興賢堂的書鋪。余治《得一錄》卷十一《各書坊公禁淫書議單條約》記載了道光十七年（1837）蘇州官府頒令禁毀淫書，十月十二日蘇州書業堂、掃葉山房、酉山堂、興賢堂、文淵堂、桐石山房、文林堂、三味堂、步月樓等六十五號書坊在邑廟聚集，訂立公議規條，⑱ 當中即有「興賢堂」一家。此外，清道光二十年（1840）長洲人（今江蘇蘇州）顧沅在興賢堂購得黃丕烈舊藏抄本《徂徠文集》，書末有顧氏題記：「道光庚子八月廿九日得於興賢堂，用番銀四餅，因其為稀有之本也。湘舟記。」⑲ 此書民國初歸涵芬樓，

⑯ 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頁43。

⑰ 李德懋，《青莊館全集》，卷64，《蜻蛉國志・藝文》，《韓國文集叢刊》，第259冊，頁162。轉引自范金民，〈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2010年1期，頁83。

⑱（清）余治，《得一錄》（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頁772-774。

⑲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張元濟全集　第8卷　古籍研究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頁3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以上與蘇州興賢堂相關的兩例記載，時間在道光年十七年、二十年，與前文分析清道光十八年（1838）前後唐少村存在經營活動的時間相合。至此可以證實，唐少村興賢堂是清道光年間蘇州的一間書鋪，並且通過唐船商人將漢籍銷往日本。至於其停業時間，可能如郭明芳所推測的，在太平天國運動以後停業。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書業遭到了破壞，商人、居民逃散，對日貿易也由此逐漸斷絕。

通過揭示唐少村興賢堂「漢籍外銷」這一段隱藏的歷史事實，這一廣告例子又帶上了東亞書籍、廣告傳播史的意義，並使得我們進一步接近其的本質：這可能是一個專門的「外銷廣告」。現存帶唐少村廣告的書籍流入日本的數量占絕大多數，[80] 在中國國內的例子大多也是清末以來日本回流的漢籍，北美、新加坡等地例子則多是1950年代以後從日本購得。如果這是因日本境內古籍存藏狀況較好而導致統計上的「倖存者偏差」，似過於規律。並且，1840年顧沅在興賢堂所購《徂徠文集》一直存藏國內，在原書上並沒有發現唐少村的廣告，這可能當時售書沒有加蓋，也可能是被後人撤去了。但如果唐少村銷售每種書都加上肖像廣告，一家書鋪經手的書籍成百上千，在中國國內留存例子不應如是之少。這當中存在一種可能，即唐少村在國內銷售的書籍並不鈐蓋肖像廣告，這個廣告是專為外銷書籍所用。

從現存帶有唐少村廣告書籍的情況看，唐少村可能有意在銷往日本的書籍上加蓋肖像廣告，以便在海外形成品牌。如其書籍在日本銷路較好，或許當地會託唐船商人下次再到店中進貨。就一般商品銷售而言，只有需要穿透和輻射

[80] 58例中有52例曾流入日本，若加上疑似3例，則多達55例。剩下的3例中，浙江圖書館藏《楚辭集解》有蔡鴻鑑（1854－1880）藏印，蔡氏英年早逝，假設其二十歲以後藏書，則此書入藏時間在1874－1880年間，就時間而言也存在從日本回流的可能，舶載書目著錄該書同為「子一」號船船員辛大帶來，輸入時間在1940年。《堯峰文鈔》據蔣寅先生所述著錄，不詳藏地，舶載書目記載舶來多部，分別是「臨時、申四、酉二、酉三、酉五、酉八、戌三、亥三」，時間段為1835－1839年。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藏《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補》，舶載書目著錄有「《歷史大方通鑑》（樊明縉雲）四」,「寅四」，輸入時間為1842年，又「《袁了凡綱鑑》六套」,「臨時、子二、辰五」，輸入時間為1835－1836、1840、1844年。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一定區域時，才有形成商標品牌的必要，就近銷售的商品一般依靠口碑即可。書店一般是就近銷售的店鋪，買家知曉自己是從哪家書店購得，如有質量問題，直接上門退換即可。若售出的書籍已二手轉售他人，則店家也不可能再包退換。倘若在國內銷售的書籍印上此類退換擔保承諾，而書籍持有者（不一定是最初購入人）又能很方便找上門的話，或許會給自己店鋪徒增煩擾。只有當書籍通過「中介」銷往外地時（「中介」非專門書商），買家不知此書出自哪家店鋪，才需要在書上印上承諾退換的廣告，以便在當地樹立品牌及誠信經營的形象。通過唐船商人這種「中介」銷往日本的漢籍，正有此需求。日本遠隔重洋，書籍的真正購入者如需退換也只能通過「中介」進行，這在實際兩國書籍貿易中有多大的可操作性，還有待史料進一步佐證。[81] 因此，這個「本坊精選新舊足冊好板書籍，倘有殘篇短缺，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承諾，其廣告宣傳的意味更大。在具體使用上，文字承諾廣告語墨記的出現時間可能比肖像紅印「唐少村小影」更早，故肖像廣告上有「先知我名，現見吾影」這樣的表述。

唐少村通過肖像廣告，將自己的形象傳播到了海外，並印上品質擔保的承諾，在當地樹立了誠信經營的品牌形象，實現了「揚名海外」，這可能是中國現存首例對外輸出的肖像廣告。雖然過去也有將帶有明代坊主肖像牌記的書籍銷往日本的例子，並且其肖像牌記在日本得到翻刻（如日本寬永年間翻刻明版《大魁四書集註》，書上翻雕有坊主余明臺肖像牌記），對當地書籍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但這些書大多是其身後由清朝商人銷往日本，而唐少村的例子則是自身主動向海外輸出的肖像廣告。「唐少村小影」肖像廣告及「本坊精選……認明興賢堂書鋪唐少村無悞」的品質擔保承諾，其本質應是一個「外銷廣告」，見證了東亞書籍貿易的歷史。希望今後有更多的例證發現，進一步證實本文猜想。

[81] 唐船舶載漢籍有退運的例子，一般是未通過書籍檢查的禁書，或估價未成而原船載返的書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論

綜上所考，我們可以獲悉，唐少村與明萬曆間坊主唐少橋是兩人，唐少村興賢堂也並非萬曆年間書坊，而是清代道光年間的一家蘇州書鋪；不是書籍的出版方，而是銷售方。唐少村效仿清代藏書家肖像藏書印，創造了「唐少村小影」這一肖像廣告，在清道光年間將大量漢籍通過唐船銷往日本。唐少村興賢堂這種獨特的廣告經營意識，在整個中國書籍流通史上都是極少見的例子。學者對出版書坊的牌記、廣告研究較多，而對經營新舊書籍的書鋪研究較少，由此造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認為扉頁的木記就是出版牌記，從而用傳統的「書坊購借版片刷印改易牌記」這種模式來對其進行解讀，但事實上會存諸多不合理之處。對於這樣一方不合常理的木記，我們在研究和編目時容易為其所迷惑。實際上，這個留存下來的清代書鋪經銷廣告，遠比書坊的刻書牌記更為罕見。這一例子也將書籍上所承載的人物肖像內涵，從「作者」（書前附刻肖像）、「出版者」（肖像牌記）、「藏書者」（肖像藏書印），拓展到了包括「經營者」（肖像廣告）在內的四個維度。從撰寫、生產、銷售到收藏，書籍產生與傳播相關的四種角色，都在書上留下了自己的肖像，借助書籍的傳播將自己形象流傳後世，這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圖書發行史與傳播史的內容。通過對曾經流入日本的唐少村經銷書籍的分析，我們可以勾勒出清道光年間唐少村興通過唐船將漢籍銷往日本這一歷史事實，使得此例又帶上了東亞書籍文化交流史的意義，並進一步認識到其本質可能是一個專門的「外銷廣告」。

過去學者對這一例子的誤讀，造成了兩方面的混亂：一是將單一肖像形象的廣告出現時間提早到了明代，而沒注意到這個肖像廣告是受到清代藏書家肖像藏書印的影響而產生的，特別是戴笠小像是在清代剃髮令下才流行的形象，將之放在明代，意識過於超前，這造成了廣告傳播史研究的混亂。二是對古籍著錄、出版史研究的影響，使得研究者誤以為明代有一個唐少村興賢堂的書坊，將帶有這個廣告的古籍著錄為「唐少村興賢堂刻本」。而當這個廣告出現在清刻本上，則被學者認為是後人造假或改竄。在中國古代圖書出版發行史、廣告史、傳播史研究中，以及數以萬計的中國古籍條目中，還有沒有其他的書鋪「經銷廣告」被當作書坊「刻書牌記」，現在也不清楚。過去我們研究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代圖書發行史以及廣告傳播史，主要是通過書坊出版發行的「牌記」及「發兌印」這一範式，而忽視了圖書銷售方在銷售圖書時的「經銷廣告」也有混入其中者，此方面的研究非常少。希望從唐少村這個例子可以有所啟發，在我們固有的研究範式上，增加作為銷售方的「書鋪經銷廣告」這一範疇，進一步深化中國古代出版發行史、廣告史的相關研究。

2014年11月1日初稿
2022年7月13日修訂

承劉斯倫兄賜告，2022年11月日本東京古典會「古典籍展觀大入札會」第798號拍品《仙佛奇蹤》（明萬曆刻本），書前白紙襯葉正背面有唐少村興賢堂文字及肖像廣告。《購來書籍目錄》載此書為「戊五」號唐船帶來，輸入時間在1838年。因正文已排版定稿，此例未及增入，附記於此。2022年11月17日補記。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佚名
《長崎舶載唐本書籍元帳》，日本江戶後期寫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清）余治
《得一錄》，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
（明）余象斗
《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四十三卷，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明）汪瑗
《楚辭集解》十五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浙江圖書館藏。
（明）胡廣等
《五經大全》，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明）梅鼎祚
《梅禹金詩草》，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75冊，濟南：齊魯書社，2001。
（宋）張鋭
《雞峰普濟方》三十卷，清道光八年汪士鐘藝芸書舍刻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魏校
《莊渠先生遺書》十六卷《附錄》八卷，明嘉靖四十年序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近人論著

大庭脩
1967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
Ōba, Osamu
1967 *Studies on Chinese Books Imported in Japan in the Edo Period*, Suida: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
1998 《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Ōba, Osamu; Qi, Yinping et al trans.
1998 *Jianghu shidai Zhongguo dianji liubo Riben yanjiu* (A Study of the Spread of Chinese Classics to Japan in the Edo Period), Hangzhou: Hangzhou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海剛
2011 《明代書業廣告研究》，長沙：嶽麓書社。
Wang, Haigang
2011 *Mingdai shuye guanggao yanjiu* (A Study of Advertising in the Ming Dynasty Book Industry), Changsha: Yuelu Publishing House.
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
2012 《中國古籍總目 集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Zhongguo guji zongmu bianzuan weiyuanhui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talogue Compilation Committee)
2012 *Zhongguo guji zongmu, jibu*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s, Collectanea Section), vol. 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江蘇省博物館
1959 《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Jiangsu Provincial Museum
1959 *Jiangsu Sheng Ming Qing yilai beike ziliao xuanji* (Selected Materials of Inscriptions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Jiangsu Provinc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杜信孚
1983 《明代版刻綜錄》，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Du, Xinfu
1983 *Mingdai banke zonglu* (The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Ming Dynasty Engraving), Yangzhou: Jiangsu Guangling Ancient Books Engraving Society.
杜澤遜
2007 《四庫存目標注 經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Du, Zexun
2007 *Siku cunmu biaozhu, jingbu* (Notes on Sikucunmu, Confucian Classics),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李鵬
2013 《中國古代圖書出版營銷研究》，北京：學習出版社。
Li, Peng
2013 *Research on the Marketing of Chinese Ancient Publishing*, Beijing: Xuexi chubanshe (Learning Press).
肖東發
1996 《中國編輯出版史》，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Xiao, Dongfa
1996 *Zhongguo bianji chuban shi* (History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in China),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永貴
2008 《中國出版史》，上冊，古代卷，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
Wu, Yonggui
2008 *Chinese Publishing History*, vol. 1, Ancient Volume, Changsha: Hunan University Press.
沈津
2011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 4 集部》，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Shen, Jin
2011 *Annotate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U.S.A., Part IV , Collectanea Section, vol. 1,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宋兆霖
2014 《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Sung, Chaolin
2014 *The Bibliophile Yang Shoujing and His Guanhaitang Library of Rare Editions and Antiquarian Books*, Taipei: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邵科
2010 〈經濟史視野下的商標法：中國與歐洲的對比〉，《清華法學》，4卷5期，頁139-151。
Shao, Ken
2010 "Understanding Trademark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a Sino-European Comparison," *Tsinghua Law Journal*, vol. 4, no. 5, pp. 139-151.
范邦瑾
2011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Fan, Bangjin
2011 *The Continuation of Descriptive Catalog of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范金民
2010 〈縹囊緗帙：清代前期江南書籍的日本銷場〉，《史林》，1期，頁75-88。
Fan, Jinmin
2010 "Selling Books to Japan: on the Sale of Books from Jiangnan, China to Japan in Early Period of Qing Dynasty," *Historical Review*, no. 1, pp. 75-88.
松浦章著；李小林譯
2016 《清代海外貿易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Matsuura, Akira; Li, Xiaolin trans.
2016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Foreign Trad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松浦章編著；卞鳳奎編譯
2007 《清代帆船東亞航運史料彙編》，臺北：樂學書局。
Matsuura, Akira; Bian, Fengkui trans.
2007 *Compilation of History Materials on Junks in East Asian Shipping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Taipei: Lexue Bookstore.
彼得・伯克著；楊豫譯
2018 《圖像證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Burke, Peter; Yang, Yu trans.
2018 *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 as Historical Evidenc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
1995 《江蘇藝文志・南京卷》，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Nanjing shifan daxue gu wenxian zhengli yanjiusuo（Institute of Ancient Documen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1995 *Jiangsu yiwen zhi, Nanjing juan* (Jiangsu's Art and Literature Record, part Nanjing), vol. 1,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侯曉盼
2009 《方寸故事：中國近代商標藝術》，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Hou, Xiaopan
2009 *Fangcun gushi: Zhongguo jindai shangbiao yishu* (The Story of Square Inches: Modern Chinese Trademark Art),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姜亮夫
2002 《楚辭書目五種》，見《姜亮夫全集》，第5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Jiang, Liangfu
2002 *Chuci shumu wuzhong* (A Bibliography of Five Categories of *The Odes of Chu*), in *Jiang Liangfu quanji* (The Complete Works of Jiang Liangfu), vol. 5, Kunming: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袁逸
1993 〈中國古代的書業廣告〉，《編輯之友》，1期，頁67-70。
Yuan, Yi
1993 "*Zhongguo gudai de shuye guanggao* (Ancient Chinese Book Advertisements)," *Editorial Friend,* no. 1, pp. 67-70.
徐乃昌
2014 《積學齋藏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Xu, Naichang
2014 *Jixuezhai cangshuji* (The Book Collection of Jixuezh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
2005 《閨塾師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Ko, Dorothy; Li, Zhisheng trans.
2005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郭明芳
2017 〈從蘇州寶翰樓出版品看清初出版文化〉，《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18期，頁1-10。
2020 〈文淵閣本《三魚堂四書大全》繕寫原因考述——兼談《四庫全書》捐書繕寫本〉，收入《中國四庫學》，第六輯，北京：中華書局，頁137-155。
Guo, Mingfang
2017 "Cong Suzhou Baohanlou chubanpin kan Qingchu chuban wenhua (Viewing Publishing Cultu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rom Publications of Baohanlou in Suzhou)," *Tunghai University Library Journal*, no. 18, pp. 1-10.
2020 "Wenyuangeben *Sanyutang Sishudaquan* shanxie yuanyin kaoshu--jiantan *Sikuquanshu* juanshu shanxieben (A Review of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cription of the "*Sanyu Tang Sishu Quanshu*" in Wenyuan Ge – and A Discussion of the "*Siku Quanshu*" Donated Book Transcriptions), in *Zhongguo Siku Xue* (Chinese Siku Studies), vol. 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pp. 137-155.
陳昭珍
2008 《明代書坊之研究》，古典文獻研究輯刊，七編，第1冊，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Chen, Chaochen
2008 *Mingdai shufang zhi yanjiu* (Research on Ming Dynasty Bookstores), Research Series of Classical Documents, Part VII, vol. 1, Taipei: Huamulan Culture Press.
陳海燕、葉建成
2014 《過雲樓藏書書目圖錄》，南京：鳳凰出版社。
Chen, Haiyan, and Jiancheng Ye
2014 *Guoyunlou cangshu shumu tulu* (A Bibliographical Catalogue of the Guoyunlou Collection),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孫文傑
2015 《中國圖書發行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Sun, Wenjie
2015 *Zhongguo tushu faxingshi* (History of Chinese Book Distribution),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崔富章
1987 〈《楚辭》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辭要籍解題》之訛誤〉，《浙江學刊》，1期，頁120-125。
2010 《楚辭書錄解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ui, Fuzhang
1987 "*Chuci* banben yuanliu kaosuo——jianji *Chuci yaoji jieti* zhi ewu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ersion of *The Odes of Chu* -- and the Falsehood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tial Texts of The Odes of Chu"),*"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1, pp. 120-125.
2010 *Abstracts of The Odes of Chu*,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笠井直美
2015 〈吳郡寶翰樓初探〉,《古今論衡》，27期，頁102-134。
Kasai, Naomi
2015 "Wujun Baohanlou chut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Baohanlou in Wujun),"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no. 27, pp. 102-134.
張元濟
2009 《涵芬樓燼餘書錄》,《張元濟全集 第8卷 古籍研究著作》，北京：商務印書館。
Zhang, Yuanji
2009 "*Hanfenlou jinyu shulu* (Catalogue of Books Remaining after the Fire at Hanfen Lou)," *Zhang Yuanji quanji, di 8 juan, guji yanjiu zhuzuo* (The Complete Works of Zhang Yuanji, vol. 8, Research Works on Ancient Book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張秀民
1989 《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Zhang, Xiumin
1989 *Zhongguo yinshuashi*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張秀民著；韓琦增訂
2006 《中國印刷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Zhang, Xiumin; Updated by Han, Qi
2006 *Zhongguo yinshuashi*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vol. 1,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張獻忠
2015 《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 明代商業出版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Zhang, Xianzhong
2015 *Cong jingying wenhua dao dazhong chuanbo: Mingdai shangye chuban yanjiu* (From Elite Culture to Mass Communication: A Study of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the Ming Dynasty),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楊立誠、金步瀛
1987 《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ang, Licheng, and Buying Jin
1987 *Zhongguo cangshujia kaolue* (A Brief Survey of Chinese Bibliophiles),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賈晉珠著；邱葵等譯
2019 《謀利而印：11至17世紀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者》，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Chia, Lucille; Qiu, Kui et al trans.
2019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Fuzhou: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雷子人
2020 〈20世紀初期商業美術之人物「塑形」〉，《新美術》，4期，頁53-63。
Lei, Ziren
2020 "20 shiji chuqi shangye meishu zhi renwu suxing (Commercial Ar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haping' the Characters)," *New Art*, no. 4, pp. 53-63.
蔣寅
2004 《金陵生小言》，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Jiang, Yin
2004 *Jinlingsheng xiaoyan* (Jinling sheng's Comment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大庭脩
1968 〈内閣文庫の購來書籍目錄〉，《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第1輯，頁33-84。
Oba, Osamu
1968 "Naikaku bunko no kōrai shoseki mokuroku (Catalog of Purchased Books in Cabinet Librar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tudies, Kansai University*, no. 1, pp. 33-84.
王三慶
2004 〈明代書肆在小說市場上的經營手法和行銷策略〉，收入磯部彰編集，《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にわたずみ》，東京：二玄社，頁31-56。
Wang, Sanqing
2004 "Mindai shoshi zai syōsetsu shijō jō teki keiei shuhō wa kōshō sakuryaku (Business Practices 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of Ming Dynasty Bookshops in the Fiction Market)," in Akira Isobe ed., *Studies of Publishing Culture in East Asia "Niwatazumi"*, Tokyo: Nigensha, pp. 31-56.
芳村弘道、鈴木俊哉
2012 《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藏小出文庫漢籍古書分類目錄》，南丹：南丹市立文化博物館。
Yoshimura, Hiromichi, and Toshiya Suzuki
2012 *Nantan shiritsu bunka hakubutsukan zō Koide bunko kanseki kosho bunrui mokurok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talogue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Koide Library of Nantan Municipal Cultural Museum), Nantan: Nantan Municipal Cultural Museum.

青裳堂書店

1984 〈藏書印譜 3〉,《書誌學月報》, 第14號，頁16。

Seishōdō shoten

1984 "Zōsho impu 3 (Collection of Bibliophile's Seal - 3)," *Shoshigaku geppō* (Monthly Journal of Bibliography), no. 14, p. 16.

高橋智

2004 〈根本通明先生蔵書紀略—根本文庫研究之二—〉,《斯道文庫論集》, 第39輯，頁91-195。

Takahashi, Satoshi

2004 "The Second Report of Nemoto Bunko Studies: A Description of the Nemoto Tsumei Library," *Bulletin of the Shido Bunko Institute*, no. 39, pp. 91-195.

笠井直美

2013 〈吳郡寶翰樓書目〉,《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164期，頁256-316。

Kasai, Naomi

2013 "Gogun Hōkanrō shomoku (Bibliography of Baohanlou in Wujun)," *The Memoirs of the Institute for Oriental Culture*, no. 164, pp. 256-316.

Brokaw, Cynthia J., Kai-Wing Chow

2005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唐少村小影（樣式一）。（明）汪瑗，《楚辭集解》（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書前扉頁廣告，浙江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2　唐少村小影（樣式二）。（明）胡廣等，《五經大全》（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書前扉頁廣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圖3　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墨記廣告。（明）汪瑗，《楚辭集解》，書前扉頁廣告，浙江圖書館藏，作者自攝。

圖4　張秀民先生描摹唐少村墨記廣告。見張秀民著，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372。

圖5　余象斗「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明）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台萬用正宗》（明萬曆二十七年刻本），卷首，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圖6　清道光十八年（1838）唐少村題記。（明）魏校，《莊渠先生遺書》（明嘉靖四十年序刊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圖7　《雞峰普濟方》，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張鋭，《雞峰普濟方》（清道光八年汪士鐘藝芸書舍刻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見宋兆霖，《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頁103。

圖8　〈藏書印譜3〉所載「華□記號」朱橢圓印，見青裳堂書店，〈藏書印譜3〉，《書誌學月報》，第14號（1984.1），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　唐少村小影（樣式一）



圖2　唐少村小影（樣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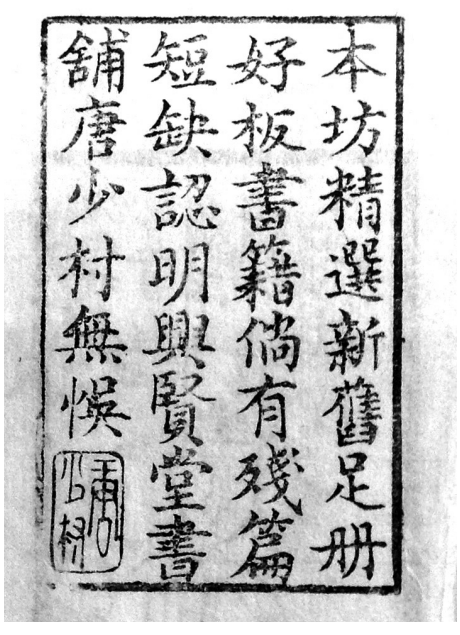


圖3　唐少村興賢堂書鋪墨記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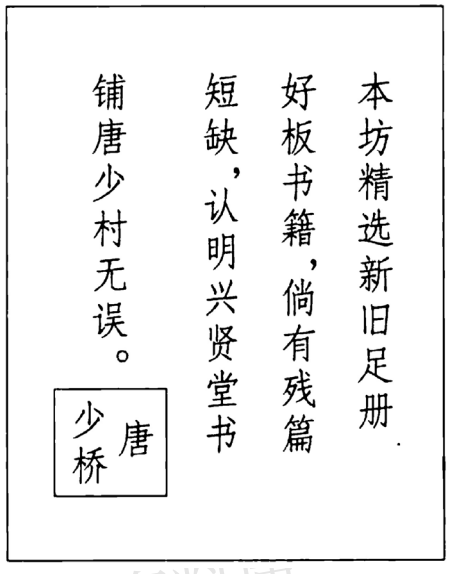


圖4　張秀民先生描摹唐少村墨記廣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　余象斗「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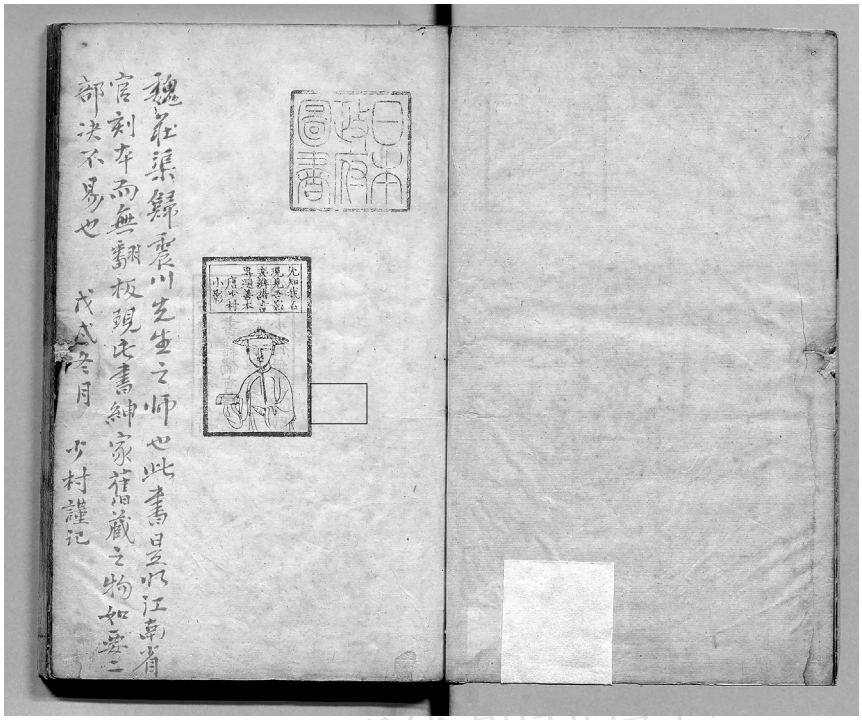


圖6　清道光十八年（1838）唐少村題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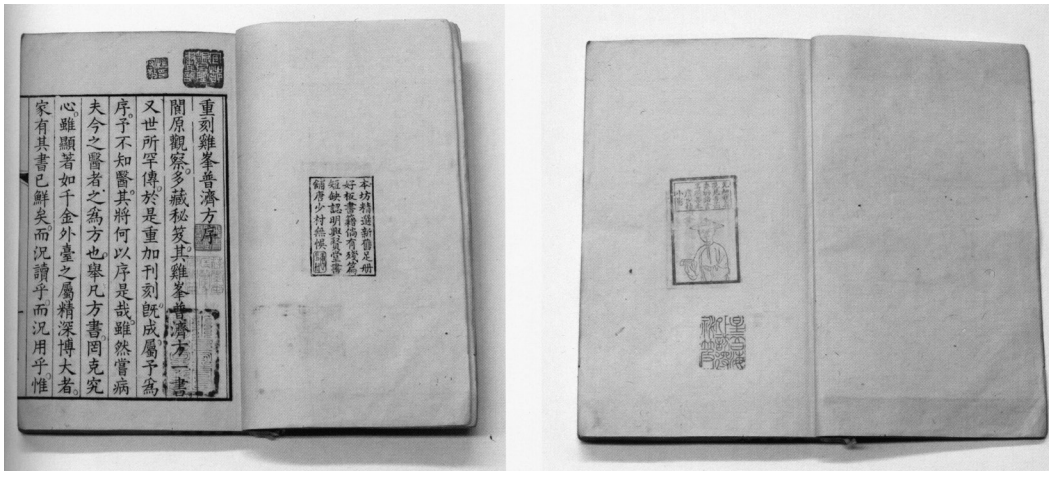


圖7　《雞峰普濟方》　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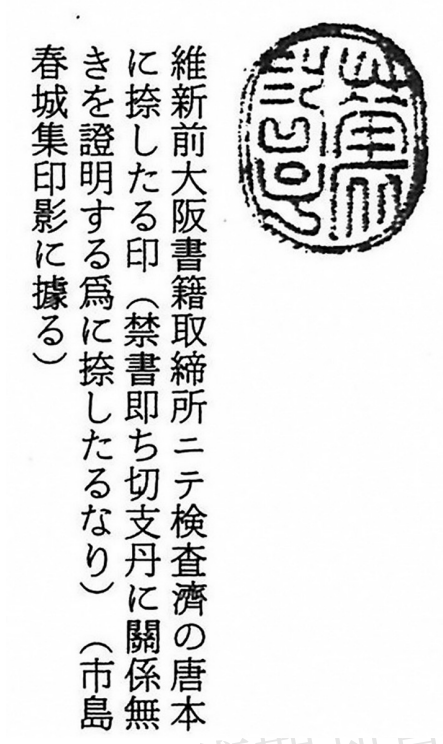


圖8　〈藏書印譜3〉所載「華□記號」朱橢圓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mmercial Portrait: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and the Book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Lin, Zhen-yu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The scholarly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and printing often cites the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Xingxian Hall Bookstore owned by Tang Shao-cun)" as a paradigm for commercial portraiture used by bookstores of the Ming Dynasty. Tang Shao-cun utilizes his own portrait as an advertisement printed along with a quality assurance commitment that his "bookstore offers an excellent selection of abundant well-printed new and used books. Look no further than Tang Shao-cun of the Xingxiantang Bookstore if there is any defects or shortages",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among the Ming book industry commercials. Scholars had previously dated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to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often considered the book editions of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ssay takes a dep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image iconography, catalog survey and book circulation hist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ortrait advertisement of Dai Li's image published by Tang Shao-cun was influenced by the exlibris seal of the Qing Dynasty rather than by the Ming advertisement. By examining more than 50 kinds of existing books with advertisements of Tang Shao-cun, Xingxiantang can be verified as a bookstore selling new and used books during the Daogua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rather than a publishing house. The article further analyzes the history of book circul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order to survey Tang's invol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export Chinese books, demonstrating that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was in fact a bookstore in Suzhou. This type of portrait advertisement was possibly primarily used for Chinese books exported to Japan.

Keywords: Commercial Portrait, book communication history, publishing history, advertising history, Tang Shao-cun's Xingxianta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